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中共「一大」开创历史新纪元

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

何功伟其人其事

2001/ 7 总第 112 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庆祝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



5月26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详细报道见本期第68-69页）

① 庆祝大会会场

② 费孝通会长致词，左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

③ 李宝光代表常务理事作《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十年回顾与今后展望》的报告（左为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

④ 5月27日，团体会员单位代表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分馆举行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2 中共“一大”开创历史新纪元 周而复
8 牢牢把握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
发展时代主题 何 方
13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吴 象

求 实 篇

- 18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冯建辉

亲 历 记

- 24 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 刘 英
28 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1976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追记 汪东林

陨 星 篇

- 36 何功伟其人其事
——写在中国共产党诞生 80 周年前夕 于光远
40 中共台湾地下党张志忠烈士 吴克泰
42 中共创建时期的蔡元培 陆米强
46 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邵力子 祥 钧

赤 子 心

- 51 彭泽民:孙中山信徒、共产党挚友 章定龙 彭润平

人 海 浪

- 58 刘长春——首闯奥运的中国人 英 武
62 寻访肖逸烈士遗踪 郭 锋
65 缅怀“纯人”汪润 徐光耀

本 刊 特 稿

- 68 十年功夫非寻常
——庆祝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侧记 严久惠
70 《炎黄春秋》的春秋 杜导正

文 荟 园

- 7 欢庆建党 80 周年 吕 鸿
69 江城子 胡吉祥
72 风雨沧桑 一树晴霞
——记中国画艺术家汤文选 汤 立

古 今 谈

- 74 孙中山思想的开放个性 贺 渊
78 清代皇权与官吏侵贪 卢 经

编 读 窗

- 23、64 读者来信二则 刘敬坤 胡野坪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杜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杨继绳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太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中共“一大” 开创历史新纪元

● 周而复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嘉兴南湖的烟雨楼，相传是取杜牧的这首诗而来的。

南湖，在嘉兴城南，所以叫做南湖。南湖一分为二，称东湖、西湖，有如鸳鸯交颈，又称鸳鸯湖。五代吴越时（约在公元940年前后），最初建立烟雨楼。明嘉靖年间，在湖心大岛上，仿烟雨楼旧制建楼。烟雨楼和上海望志路举世闻名。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迁往北京，改名《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传统思想宣战，掀起救亡图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鼓舞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的光明大道上前进。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先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兴起给予中国以积极影响，1919年沉沉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五四”运动，表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以陈独秀、李大

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问题。不久，南陈北李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带着妻子库滋涅娃和翻译杨明斋到了北京，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真实情况并帮助建立共产党。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并与先进分子进行座谈，研究并帮助建党。在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以及法国和日本等地，都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了中国。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4年，他赴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创建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党。1920年7月，他作为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接着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6月，他到了上海。

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尼科尔斯基也于同年6月到达上海。尼科尔斯基，苏联人，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曾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

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和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数次交谈，他们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些省市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情况，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与初期工人运动。共产国际代表根据中国革命活动的实际情况，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先向陈独秀、李大钊征询意见，确定召开日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便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系并准备开会事宜。这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石库大门里召开。（注）出席13名正式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13名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来自日本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辞职没有获准，无法出席，委托包惠僧参加会议。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事先没有取得联系，未派代表参加；李大钊忙于北大校务，也未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大会推举张国焘担任主席。建立共产党、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是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时，代表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对马克思理论缺乏了解，必须进行长期教育；目前，首先要以马克思理论武装知识分子，然后再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主张党应该成为公开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无需党员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第二种意见认为党应该积极进行工人运动，并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工作。大多数代表赞成第二种意见。

在讨论党员能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在现政府做官时，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党员可以当议员，可以做官，无任何危险，党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另一种认

为，反对党员当议员参加议会斗争，不能和资产阶级一起当官。这么一来，会使工人对议会产生幻想，逐渐放弃革命原则，甚至变成无产阶级叛徒。大会对此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在讨论对其他党派态度时，基本上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无产阶级应该永远与其他党派斗争，北京政府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是一丘之貉，并无不同。第二种意见认为，为了反对共同敌人，可以和其他党派合作，但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他们，这样，并不违背党的原则；南方孙中山政府要比北京政府进步一些，应该支持南方政府的革命运动。会议讨论通过第一种意见。

“联合第三国际”提法和马林的意见是不同的。他在大会开幕致词中曾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介绍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特别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



中共一大会场

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李汉俊赞同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采取一致行动,但无须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用“联合共产国际”的措词,实际上不接受马林提出的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问题延迟到一年之后的中共“二大”上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7月30日夜晩,满天乌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风,也没有雨,仿佛暴风骤雨将到来以前的闷热天气,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连弄堂里的路灯也昏昏沉沉,好像怕热似的。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先后到了餐厅,马林正准备讲话,从后门灶披间那儿,忽然闯进来一位中年男子,身穿灰布长衫,反卷袖口,露出里面白色府绸褂子的袖口,东张西望,环视坐在餐厅里的每个人的面孔,好像在找人,在场的人却谁也不认识这位长衫客,更没人知道他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李汉俊不认识其人,立即问他找谁,那中年男子随口答称:找社联王主席。李汉俊告诉他这儿没有社联,也没有王主席。那中年男子弯腰后退,承认找错地方,悻悻而去。大家正感到诧异的时候,马林拍了一下餐桌,判断这人一定是化了装的包打听!建议立即停止开会,马上分头离开。大家同意马林判断,迅速离开,只有房子主人李汉俊留了下来,以观动静。陈公博也没有走,他和李汉俊到楼上书房里闲谈,要看看马林的判断准确不准确,同时了解一下李汉俊怎么应付。这以后发生什么情况,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知道。李汉俊早已逝世,没有留下什么回忆这次惊险遭遇的文章,倒是陈公博在事情发生十来天以后写了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其中有这样的叙述: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

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是寻常的叙谈。他便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的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篋,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按:朋友指李汉俊)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对陈公博、李汉俊询问以后,陈公博反问他为什么来搜查,那个侦探才说,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搜查完毕,那个人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侦探搜查十分认真仔细,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确凿证据,便说“通融办理”,给自己台阶下。陈公博在以后回忆文章中常提到一个重要的证据,即放在抽屉里的共产党组织大纲草稿,这是一张薄纸,上面涂改许多地方,叫人难于辨认所写的内容,以为是一张废纸而忽略过去了。这次突击搜查,有当事人在场,甚是惊心动魄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如果没有忽略这张“废纸”,人物俱在,难逃法网了。幸亏马林当机立断,没有发生意外,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能在原地举行了!

代表们为什么要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会议呢?

1949年6月初,我带领一百多人乘船从香港开往当时还称作解放区的天津市,因为船上挂的是外国旗子,沿途没有遭到什么阻扰。这一百多人当中,有许多著名人士,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李达同志等。他当时年近花甲,但是身体健康,并且结实,个儿不高,剃了光头,两眼奕奕有神。平时沉默寡言,是一位谆谆长者,接触以后,他谈吐甚健、热情洋溢、舌粲莲花、娓娓道来,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他从不主动谈自己的往事,我向他请教:为什么“一大”会址被法租界巡捕房发现以后,不在上海其他地方举行,要跑到

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他微歪着头，沉思了一会儿，才有条有理地慢慢告诉我，大家分别离开李汉俊家，又陆陆续续聚集到渔阳里二号来了。这儿原来是陈独秀住处，陈独秀到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去了，他的妻子高君曼和李达、王会悟夫妇住在这儿。包惠僧从李汉俊那儿了解到法租界巡捕搜查的情况，回来告诉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惕性和卓识远见，不能继续在原地开会，李达建议换一个地方。渔阳里二号和博文女校已经半公开了，前者是陈独秀他们活动场所，不宜开会；有人建议去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一则路远，二则旅游胜地，耳目众多，也不是开会的地点。

王会悟是浙江桐乡县人，李达的贤内助，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她帮助李达做大会的筹备工作，日夜操劳，代表们住处这些事，她都妥善安排。她看到代表焦急不安的神情，急切找不到适宜继续开会的地点，便动脑筋、想办法，她曾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对嘉兴情况十分熟悉，了如指掌。她还经常往返嘉兴、上海之间，对交通情况也相当了解。她建议到嘉兴继续开会，路途不远，只有到杭州的一半路程，坐火车不到三小时，火车站附近就是南湖，平常游客不多，相当幽静，湖上有大小游船，大的游船坐上十多个人不成问题。在船上开会，谁也不会注意，更不会被人发觉。李达曾和王会悟一同游过南湖，他认为去南湖开会，倒是不错。李达和王会悟推荐，代表们觉得在南湖开会比去西湖好，但是不知道火车班次的具体时间。王会悟如数家珍，立即说出每个班次从上海开出和到达嘉兴时间。大家心中有

数，计算开车和到达时间，十分高兴。李达说明目前形势紧张，法租界巡捕已经发觉和注意会议活动，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坐明天第一班车去嘉兴，上午七点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点二十五分到达，开会的时间比较宽裕。大家同意李达的意见。大家研究：马林和尼科斯基不能去，否则要引起当局注意。李汉俊也不能去，他要在家应付可能还要发生什么事情，也避免巡捕房对他跟踪。其余的人都约好分别上明天第一班火车，分散坐开，装做互不相识，只有李达和王会悟坐在一起，夫妇两位摆出游客的样子，言不及义，闲谈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火车发出隆隆的响声，向嘉兴驶去……

7月31日上午10点25分，那列快车从上海开到嘉兴，停在站头，发出咿咿的声响，好像跑了长途的旅客到达目的地以后发出气喘吁吁。代表们纷纷各自下车，走在最前面的是李达和王会悟，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王烬美，还有不是代表但是陈独秀指定出席会议的包惠僧，三三两两分别尾随在后，各自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同互不相识的路人。

王会悟对嘉兴非常熟悉，先带领大家到鸳



嘉兴南湖画舫

湖旅馆开了房间,让大家暂时落脚洗脸、吃点心,她到旅馆账房先生那儿,订了一条画舫,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一切准备妥当,她和大家到了湖边码头,分批坐小船上了画舫。等大家都走进前舱,她已准备好茶水,让船工到后舱去准备酒席饭菜,便把麻将倒在八仙桌上,让他们装做打牌的样子,继续开会。她叫船老大开船,自己坐到船头,兀自欣赏南湖优美的景色,暗中观察四面八方的动静,有什么风吹草动,好随时向前舱报告。

“一大”在前舱继续开会了,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有任何联系。党纲严格规定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只有承认党纲和党的政策,并愿意忠实执行的人,才可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纳新党员必须履行严格的入党手续,在一定组织内生活。党纲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实行上级对下级的严格监督,强调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观念。‘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讨论通过的第二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和要求,组织产业工会为党的主要目标;党应该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和劳工组织讲习所,以共产主义教育工人,并决定建立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每个党的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党的宣传刊物,但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党对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不

同其他的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确定党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方法。

“一大”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一大”通过的文件:“纲领”没有留下原件,只找到俄、英两种文本。俄文文本是原第三国际保存的;英文本是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由C.M.维尔巴编辑出版。两种文本内容基本相同,并且都缺第十一条。至于“宣言”到现在没有找到原件,也没有俄文本和英文本。

李达同志和我谈到“宣言”时,十分感慨,说,因为是在地下秘密状态召开的,又被法租界巡捕房干扰,保留下来的文件极少,要找到文件的原件恐怕很不容易了。他记得“宣言”的内容多半引用和抄袭《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后说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的根据,最后一句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因为全国党员人数不多,决定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

会议在画舫里进行到下午六时,大会主席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激动地但是轻声地呼喊了三句口号:

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纪元。代表50多名党员的13位战士,在当时四万万同胞中的数字小得微不足道,不过沧海一粟,却似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燎原。

从“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和“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明确认识到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的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当时党在草创的幼年时期，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即无产阶级应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懂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与应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前进道路上，有过曲折和坎坷，有过险阻和失败。但是坚持不懈，吸取经验，总结教训，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个春秋过去了，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共产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又经过风云变幻和激烈斗争的十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这个婴儿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几十年来，在前进道路上，既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胜利，也发生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错误与失误，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给党蒙上了不良的阴影。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伟大的，其伟大就在于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伟大的国家终于走上了充满希望和阳光的大道。正如董必武同志在《九十初度》七律所吟咏的那样：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经》）

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为什么现在定在7月1日？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周年纪念指示》规定，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开幕日期难于查明，故把七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责任编辑 方 实）

欢庆建党八十周年（七古）

● 吕 鸿

“十月”冬宫炮声隆，
骤起惊雷震宇穹。
真理光芒昭四海，
浩歌激亢唤农工。
“七一”立党鸿猷展，
星火燎原势愈宏。
万水千山逾艰险，
金戈铁马誉前空。

一代巨人毛泽东，
翻山倒海九州红。
邓公“特色”明光道，
斗转星移不朽功。
三个“代表”卓识远，
驰骋新纪竞英雄。
菁英辈出承宏业，
续谱金篇绘彩虹。

牢牢把握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
何方

从党的历史看把握时代主题的重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整整 80 年了。80 年来,党走过辉煌的道路,取得了巨大胜利和成就。但不容否认,也走过弯路,遭受过挫折和失败。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看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主题,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结合得好,就走向胜利;结合得不好,就遭受挫折。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很快投入和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只是由于党太年轻,缺乏经验,共产国际不了解情况又直接指挥,遂使这次革命夭折。后来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才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1935 年的遵义会议,标志着党领导革命已趋于成熟,此后所执行的已经是既符合中国实际又符合时代主题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从而陆续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列宁说,只有首先估计到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 680 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时代的基本特征即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680 页)而我们所制定和执行的战略与政策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的主题,所以便进展顺利、势如破竹般地取得了胜利。

约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下半期起,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减少,世界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逐渐转化为“和平与发展”。但我们却未能觉察到这一转化(客观上也有冷战的掩盖),仍然按照旧的时代主题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没有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还对内热衷于阶级斗争和不断的“政治运动”,对外搞闭关自守、支援世界革命和准备打仗,最后更以“文化大革命”把中

国经济推到崩溃的边沿。

在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后,我们又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不再像搞革命那样得心应手了。其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这20年中,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中国过去的教训是对外搞了闭关自守,对内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引自198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时的谈话)这就使我们在世界大发展中丧失了一次大好时机。我国经济占世界比重从1955年的4.7%下降到1980年的2.5%,由原为日本的将近两倍降成它的1/4。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60年超过我国4600亿美元,1985年已超过36800亿美元。(资料来源见1988年4月6日《人民日报》和1993年7月20日《经济时报》)改革开放后,我们经过20年的追赶,现在的经济占世界比重才达到3.5%,还没恢复到45年前的水平。

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重大历史转折,主要做了两件大事:进行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我们党又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虽然这一转变有个过程,但终究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出现了中国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阶段,产生了被中共十五大报告称为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的邓小平理论。

提出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 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 重大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的根本判断仍然有过去的影子,一时还没有看出时代主题已经改变,还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论断,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

世界划分”的理论,这就不能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搞建设。如何从“深挖洞、广积粮”及“支援世界革命”等口号中跳出来,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国内外政策,不但中央领导在考虑,全国人民极为关心,学术界也在积极献计献策。例如外交家李一氓就给中央连写报告,提出和平可能维护,不应再讲战争不可避免;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缺乏根据,应予摒弃。另一位外交家宦乡也建议改变“一条线”战略,拉开同美国的距离,缓和对苏关系,团结发展中国家,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和党中央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又集思广益,逐渐改变了对世界主题与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1984年后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为我国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本路线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还成为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制定和调整政策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邓小平就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见《邓小平思想年谱》302页)20年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

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提出,不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就已明确“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把它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又进一步强调了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问题不但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是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提出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例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说世界和平能够长期维护、世界大战打



1979年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阳台上

不起来,那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经过自身调节仍将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国际关系中经济成为重点,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主要斗争形式,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使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的论断失效;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国之间的矛盾只限于竞争与协调、斗争与妥协的范围;局部战争仍然难免,但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历史表明,毛泽东1964年提出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后来的大小三线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使全国长期处于临战状态,都是估计和决策的严重失误。正是由于对战争危险的重新评估,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才能下定决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出跨度长达70年的三步发展战略;同时调整对外方针,实行全方位开放,改变“一条线”战略,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认定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表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形势有了新认识,改变过去那些过时的、不切实际的估计,摒弃过去那些空洞的、过激的口号,我们就不会再干那些“自己饿肚皮去无偿支援别人”的傻事了。维

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页)中国的事情办好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强大了,世界和平得以维护,世界经济得以健康发展,便是中国对于发展国家的极大贡献,便是中国人民对于全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

准确理解和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对一个相当时期整个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最高战略判断,因而是据以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是观察和处理各种国际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和立足点。如何认定和把握时代主题,关系着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已快20年,三次党代会都有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中央也一直在重申和强调。但是仍然有一种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意见,不承认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存在。这在科索沃事件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说,“所谓和平与发展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见《中流》1999年第11期)还有更唬人的说法:“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警醒,……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平”的前途是没有的;至于“发展”,其结果也是“利润流向西方,贫困留给第三世界”。为了否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些文章说,邓小平谈到和平与发展时只讲是“两大问题”,没有用“时代主题”这一概念。是的,邓小平最初提出这一问题时是这样的,但这些文章的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明确表述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十三大报告,是经邓小平审阅并由代表大会通过了的。至于有人用邓小平说过的“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

一个也没有解决”的话来否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也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当时这样讲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在那样的国内外形势下,要唤醒人们更加提高警惕,努力维护和推进和平与发展。这些同志还是不大了解时代主题的含义,以为“没解决”就是“不存在”。按照马克思、列宁和国际共运关于时代的学说,时代主题是指一个历史阶段整个世界形势的主要内容(即主要问题和基本特征),既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也是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主观要求和奋斗目标。而无论从现实还是目标讲,当然都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早已是现实,但能说已经解决了吗?帝国主义时代作为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同样也不能说已经解决。

认准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就要牢牢把握,万万不可一遇风吹草动便发生动摇,影响对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这一基本国策的信念。例如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发生“八九政治风波”后遭到西方七国“制裁”时,国内也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担心和看法。但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却处变不惊,稳定掌舵,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他说:“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353页)这里所说的“许多提法”,当然包括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在内。由于看得准,站得稳,不但使我们顺利渡过难关,而且还在随后邓的南巡讲话的号召下,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科索沃事件的发生,特别是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后,曾引起某些同志思想上的摇摆,但在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轰炸使馆事件终于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理,人民群众的情绪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国际风云变幻,突发

事件的发生难以避免,提高警惕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我们更要坚持对形势的根本战略判断,遵守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原则。

有些人断定世界已开始了新一轮更激烈的军备竞赛,主要根据就是美国军费的增加。确实,美国为了推行霸权主义,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几年前已结束了冷战后的军缩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武装力量战斗编制缩减近一半),开始了军费的逐年增长,以推行它的国防现代化纲领与军事革命,采用新技术装备(一些激进派认为现有军种和装备只适于“过去的战争”,甚至主张取消坦克、航母等)。这当然应予高度警惕,研究对策。但是否可称为新军备竞赛,则值得怀疑。因为世界军备竞赛主要指大国之间。一些中小国家如印巴间和中东的军备竞赛可说从未停止,但影响主要限于地区,不会导致世界大战。可在大国间,美国的竞赛对手是谁呢?俄国今年的整个国家预算只合250亿美元,还不及美国三千多亿军费的1/10,显然无力也不会参加。按照邓小平制定的国策,中国不参加军备竞赛。只美国一家,没有对手,怎么能叫竞赛呢?

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冷战期间,美国的计谋之一就是用军备竞赛拖垮苏



1991年5月25日,邓小平在谈到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时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联。为此,它不但用各种办法刺激苏联,中央情报局还故意夸大苏联国力。苏联当局也打肿脸充胖子,20世纪70年代中就宣布它的经济是美国的一半多(67%),并且集中全力扩充军备。其后果已无须多说。现在美国又故伎重演,除鼓吹中国的强大外,还设法激怒中国,而有些军事措施如战区导弹防御也确实针对中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有冷静的头脑,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的基本国策,不要上美国极右势力的当,被美国拖入军备竞赛中。回想在七国对我们实施“制裁”时,邓小平一方面表达了我们的坚定态度和原则立场,但还是强调要和美欧日搞好关系,说“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浪吹不倒我们。”(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而且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更多的仍然是:“机会难得”、“发展是硬道理”、“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等等。总之,邓小平的方针是,既然看准了不会打世界大战和发生大规模的外国入侵,就要抓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松手,不为一时一事的变化所动。因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一切都办好。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出于种种原因,总希望中国在某一个方面“当头”,把我们推向某种斗争的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十分谨慎,要记住邓小平一再强调的:“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因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我们的传媒和舆论,对外界反应要冷静分析,权衡利弊,作到全面客观,不能只讲甚至夸大和渲染外国反应的某一方面。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宣传报道上,同样应提倡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要让人民知己知彼,了解事实真相,而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坚持“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的原则,不但是应付当代国内外复杂情况的需要,也是我们党一条重要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早就指出,每当我们党骄傲了的时候就一定会遭受

挫折。而他老人家的最后20年的失误,也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邓小平提出“绝不当头”当与此有关。他曾提醒,“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情况估计得比我们乐观一些,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7页)要时刻谨记,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穷的,再努力奋斗三五十年也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千万不能忘乎所以,更不能再犯以前那种刚吃饱就又折腾起来的老毛病。这里用得上邓小平在他的文稿中为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责任编辑 洛松)

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同时必须充分地看到:第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继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二,建国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确立起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这些都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的条件。

(引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 吴 象

在胡耀邦辞世八年后——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万里对采访者说：“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

（一）农村改革的开端

的确，万里这番话，深切地道出了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风云的真情。

从农村改革的整个进程来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这一步棋非同小可，不仅使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活了过来，整个中国的局面也因此而全盘皆活。万里最早坚定地认准了这一点，力排众议，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支持农民的行动，因此他成了公认的农村改革的大将，农村改革的进程多次留下了他性格和作风的印记。但是，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如果没有当时中央党政一把手的支持，万里遇到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甚至包产到户还有再一次夭折的危险。回顾这一段历史，胡耀邦对万里无所不在的全力协助、多种多样的主动配合，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



胡耀邦

性的因素。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被调回北京，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在此之前，胡耀邦和万里没有共过事，但他们有一段相仿的经历。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排除万难开展治理整顿，曾点将指派他们二人分别到科学院和铁道部去挂帅。一个大刀阔斧，一个雷厉风行，都干得很出色。可惜这场“改革的预演”不久即因“四人帮”的破坏而夭折，邓小平又一次被迫下台，他们二人也作为邓的“黑干将”又一次被打倒了。

现在，胡耀邦对万里的新任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

1977年6月万里再次复出,任粉碎“四人帮”后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两年多来,充分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拨乱反正的决心、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他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经过调查研究,制订了“安徽省委六条”,顶住“学大寨”、“穷过渡”的压力,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他又突破“六条”本身不合理的条款,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片面做法,支持农民包产到组;他针对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况,反对“打肿脸充胖子”,采取“借地种麦”的特殊措施,从而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支持农民实现新的突破。

他力排众议,对激烈争论的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加以保护,确定山南为省委的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后又亲赴小岗村考察“包干到户”,给予最坚决的支持;他开完十一届五中全会就赶回合肥,从1月2日至11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并公布了他在省人代会的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宣布“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的区别”。

至此,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计划经济大统一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就像粮票一样可以流通,畅行无阻。不过这还只是“地方粮票”,只能在安徽境内流通罢了。

当然,改革的道路是充满荆棘、阻力重重的。有人攻击他是“刘少奇路线复辟,曾希圣阴魂不散!”有人发誓:“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老牛会讲话,也会到北京去告状!”肥西县部分干部居然作出“决定”,发红头文件纠正允许山南包产到户试点的所谓错误,遭到广大农民强烈的反抗,不得不又作出另一个决定,来纠正这个纠错的错误。对这一切,万里处之泰然,没有皱过一下眉头。

(二) 配合默契

调到北京以后,万里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安徽要困难得多,京城不比外省,斥责包产到户的呼声不只是小小的杂音,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而自行其是的更不只是小小的县委,尽管万里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方念起农业文件上的两个“不许”的“紧箍咒”,他不能不感到头疼。特别是农口的主要机构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念的还是学大寨的那一本经,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有人在,似乎越往上比重越大,理由越多,态度越坚决。农口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在1980年二、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攻击包产到户违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刚兼农委主任的万里唱对台戏。他离开安徽以后,新去的省委主要领导也改变了态度,先是拒绝反驳攻击包产到户的文章用安徽省委政研室的名义发表,紧接着又先后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面最广的凤阳和整个滁县地区压力很大。这对万里来说,简直等于后院失火。但是,更多的农民在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浪潮,万里一直坚定地站在这个历史浪潮的潮头。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5月发表了重要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最有力的支持和肯定。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止息。包产到户越发展,反对的声浪越高,不过当时毕竟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民受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洗礼,变得更聪明,也更有勇气,只要让他有自主权,他就会不声不响把包产到组变成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证明家庭经营的确是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一个难以磨灭的特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过早完全否定家庭经营的作用,终于导致它本身的被否定。但是在1980年,公社仍然固若金汤,站在农民一边明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者,为数十分的少,因此处境暂时

比较孤立,受到习惯势力的攻击。在这种形势中,万里得到了胡耀邦的有力支持和策应。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点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列举情况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万里与胡耀邦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早就有过交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见到农业文件的第一稿时,就曾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他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是没有被采纳。

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是热情支持的,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着地要求包产到户却缺少具体的体会。1979年冬,他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转给他的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安徽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他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情谊日深。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万里对胡耀邦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三)分头工作

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大同小异,总的趋势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请问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不说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只能继续拖一段不长的时间而已。山西省就是这少数地方之一。几年来,省委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大寨是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成长的,山西是

坚持学大寨的。”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土“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纪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要照着去做。”虽无明文规定，却在全省畅行无阻。因此，拨乱反正，迟迟不见动静，对联产承包一直拖着、顶着，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继续受到压抑。这时普及大寨县过程中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错误陆续被报刊揭露出来，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但情况仍无根本性变化。胡耀邦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出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这大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促进7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这些观点在此后一系列农业文件包括五个一号文件中不断得到体现。万里常说：“‘左’的思想影响谁也难以避免，我们有没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分，觉悟先后之分。”合作化以来，尤其是学大寨以来，搞了多少次运动，整了多少农民和农村干部，这次包产到户，就其范围和深度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但中央却没有因为哪一个干部抵制包产到户而对他加以惩罚，一个都没有。总是说服教育，耐心等待。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大农民的实践取得出人意料巨大效益，使包产到户在多种责任制形式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遥遥领先，推动着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1981年2月，三位新华社记者和特约记者，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边三个专区的十一个县去调查考察，他们深深感到广大农村正在进入一个似乎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性转折，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统统冲光！长期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举跃入对国家贡献大的先进行列。这不是一个公社、几个公社而是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的根本性变



万里

化。1980年收成较好，但丰收主要不是靠天。农民们说，这样的年成过去不止有过一次，为什么都没有去年收得多呢？可见主要是靠人。“人积极，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这是公正的评价。

这次考察中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这么多粮。许许多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还留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囤，连睡铺也不得见缝插针，挤在夹缝里。他们笑着说：“现在可好，睡觉不知道天亮。”粮食多了，收入高了，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地区，大多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好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反映：“包产到户，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活没有少干，粮没有少见。”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先进社、队，各县一般只占15—20%，社员们一方面看到本队单产高，家底厚，认为还是集体好，不敢也不愿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看到包产到户有实惠，有自由，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又觉得羡慕，心里痒痒。至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社员无不跃跃欲试。实际物质利益比任何行政手段、行政办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胡耀邦见到这次考察发回的五篇内部参考稿件,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三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他还让中央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他说,农村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赶快让作家们知道,鼓励作家们去观察、去感受,写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四)一号文件

农民普遍行动起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却被当作攻击包产到户的借口。胡耀邦提出,看来今年还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也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1980年的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万里恳请胡耀邦召开的,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却是胡耀邦主动提出来的了。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但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到中央红头文件上去的。为了慎重,没有赶时间。文件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1号文件了。

第一个1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简单地说,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了。

第一个1号文件作为1号文件带有偶然

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1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这真是万里求之不得的事情,“地方粮票”终于变成“全国粮票”了。

连续五个1号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央领导和亿万农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心连心的,5个一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1982年是包产到户向全国总进军的一年。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第一个1号文件的肯定,顿时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两年前农业文件提出“三个可以”,农民把前两个“可以”甩在一边,对后边那个“也可以”却大干特干。现在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农民又纷纷撇开其他,认定这种大干特干,使之迅猛推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汇成不可阻挡的巨大浪潮,压倒各种责任制形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制形式。社会舆论也倒向包产到户这一边,独木桥变得比阳关道更阳关道了。

1982年,在连续三年丰收之后又一次夺得了大丰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统有分,弹性很大,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个伟大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胡耀邦、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还有位更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这件事的意义不能低估,尽管不能公开对外讲,但应当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 吴思)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 冯建辉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讲过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话:“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时间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的党史讲陈独秀怎样呢?应该说有进步,但还不如人意,陈独秀似乎还是个“敏感问题”或“犯忌”的话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党,如何对待陈独秀,不仅仅是陈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能否实事求是地看待党的历史,怎样科学地评价党的各种领袖人物,如何对待五四运动的思想遗产等重大问题。我作为党史工作者,愿直陈刍议,就教于读者与有关部门。

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是历史的合理选择

陈独秀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当选为五任总书记(或书记、委员长)呢?长期以来,许多史书的回答是,党的幼年时期选错了领袖,并按这个调子对历史作剪裁。我以为要实事求是写这段历史,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陈独秀是五四时代的一面旗帜。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前期高扬“科学”、“民主”口号,批判旧思想,传播新思潮,后来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受到广大青年的欢

迎,盛赞陈为“思想界的明星”。1916年11月,读者顾克刚写信谈他读《新青年》的感受:“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1917年2月,湖北陆军第二预校学员、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将领的叶挺,致函陈独秀:“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陈独秀本人从1915年至1922年八年中,共写了近400篇文章,其中仅1919年一年,就有150多篇。他的文章著述涉及面极广,有理论、政论、哲学、历史、时事评述、宗教与迷信、人口问题、教育与卫生等等。以崭新的思想,磅礴的气势,犀利的文风,鼓舞和教育了一代青年,也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

陈独秀1919年6月9日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事件,在社会各界掀起巨澜。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进化一线新机,恐亦因此摧毁殆尽,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工商界人士呈文北京政府总理,担心“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此开始”。《时事新报》更是大声疾呼:“吾们人人下个大大的决心——肯拿陈先生的志愿做自己的志愿……着手去做那——解放和改造的事业。”著名人士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写《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其二,陈独秀是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就称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中国的列宁”。多少年以后毛泽东讲起当时的历史情况,也把李大钊等放在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中,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我讲一点情况,某些史书常常把陈独秀形容为脱离工农的“贵族老爷”。其实,陈独秀在建党前就认识到“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决心做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到那里和他们同住”。他带头做工人运动,代表了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正确方向。1920年9月出版的《劳动界》刊出工人来信,称陈独秀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上海《时报》1920年4月20日,对陈独秀参加工人运动作过详细的报道:“18日午后一时,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代表等,开联合会议于中华工业事务所,筹备5月1日世界劳动大会一切事宜。”“特请陈独秀讲劳工要旨”,“后由众推陈独秀、汤松为筹备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顾问”。5月1日,在纪念大会上,陈独秀置军警镇压的危险于不顾,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不是要倒塌吗?”

其三,陈独秀对建党做出最重要的贡献。毛泽东说:“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早在1920年1月,陈独秀就和李大钊商量建党事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5月以后,陈独秀首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开始称“社会党”),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旗帜。此后,陈独秀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花了很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如:1920年10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共同商讨,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党组织的一些成员,是陈独秀亲自做工作并发展的;

1921年1月,陈独秀赴广州,和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等一起重新改建广东党的组织;湖南党的组织的建立,更是和陈独秀有着密切关系:1920年4月,毛泽东赴上海与陈讨论“湖南改造联盟”计划,毛回湘后,两人始终保持通信。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通知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共党的组织,是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张申府等建立的。正因为如此,党的“一大”,陈独秀虽然因故未能参加,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即后来称的总书记)。

其四,以陈独秀为首的第一任领袖班子具有启蒙色彩。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团体转变而来的,由学术团体到无产阶级政党,从时间上有着明显的标志:1921年7月1日。然而从学术团体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转变,却不是一个早晨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变的历史过程。党的早期领袖是一批学者型人物,是冲出书斋学院大门走向工农大众的先行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广大工农群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然而面对远比书本理论复杂多少倍的现实的阶级斗争,却不可避免地带着书生气。由陈独秀主持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指出:“说到我们党的状况,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的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班子的不成熟状况,正是全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一种反映。所谓“幼稚”、“不成熟”,主要是指尚未完全摆脱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影响。这一历史情况和党的状况造就出的领袖陈独秀,自然也具有启蒙的印记与色彩。

“二次革命论”的是非曲直

“二次革命论”一直被当作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批判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在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对此提出质疑。应该怎样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思想和历史上对它的批判呢?

评价“二次革命”思想,首先要了解产生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并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当时,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不统一,特别是对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施存统认为,中国搞民主革命很难成功,只能搞国民革命运动;恽代英则把参加民主革命看作一种策略手段;蔡和森认为:“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才得解决”;瞿秋白主张在国民革命中劳工阶级要争夺“领导权”,但又提出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可以直达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于1923年前后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了他的意见,围绕“国民革命”进行了若干理论性探讨,这些意见被后来批判他的人称之为“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分两段路程”。陈独秀认为,中国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中国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此“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斗争……不但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对于现在中国政治之我见》)陈独秀的中国革命“分两段路程”,强调第一段路程对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重要性的思想,是正确的。对澄清党内各种模糊认识,动员全党积极投入民主革命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次革命论”对国民革命前途的认识处于一个摸索过程中。陈独秀开始采取“只管现



陈独秀

在,莫问将来”的态度。到1923年底,他经过研究,对国民革命前途做了两种可能的预测:“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否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形势而决定。”这一认识,从客观上说,是由于国民革命刚刚开始,各种矛盾的展现和发展趋势尚不明朗。从主观上说也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缺乏政治远见,忙于应付现实的弱点。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系统的

右倾机会主义理论。

“二次革命论”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认识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不久,只有几百名党员,而国民党已经有二十几年革命历史、有几万党员、且有全国影响的大党。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展工作。在这一特殊形式下,中共公开表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是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同时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是“最先全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起民众,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这里,把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责任定为“促进”、“唤起”、“督促”、“引导”,应该说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历史情况的,不是什么“向国民党投降”。陈独秀在领导权问题上有错误,其表现主要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能处理好统一战线的合作与自主、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讲联合时往往忽视斗争,讲国民运动时往往忽视阶级运动。

陈独秀作为中共建党初期的主要领袖,他的“二次革命”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也代表了我们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它的正确方面与缺陷方面,都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应该在党的理论发展史上占有

一席之地。

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曾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方面，促进了党的民主革命理论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对纠正大革命后期的右倾路线，实现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然而，这一批判从理论角度看，基本上是以“不断革命论”来否定“二次革命论”。批判者主张国民革命发展下去，“很可能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联系时，又模糊了两者的区别，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陈独秀与托派问题

托派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反革命的小组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的汉奸。1991年7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对有关注释做了重要修改，不再提上述帽子，而是做了如下叙述：“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该书125页）在另一注释中又增加了如下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实践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该书555页）上述提法，反映中央有关部门对托派评价和认识的变化。

1992年5月，由北京党史学会和陈独秀研究会召开的“第二届陈独秀研讨会”，对陈独

秀与托派问题发表了如下见解：“与会者还认为，应当把托派问题分成两个阶段来认识。即：解放前的托派组织，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极‘左’的宗派团体，是内部矛盾性质。解放后的托派组织，则是企图另建新党及其武装，妄图推翻中共政权，成为反革命组织其性质已成为敌我矛盾。陈独秀的问题是属于前者非后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中共党史通讯》总88期）

这里，我要补充两个情况：一是1953年8月《中央公安部关于托匪破案情况及处理意见向中央的报告》说：“各地经过六个月来的审讯、管教与调查研究的结果，除少数老托匪领导分子表现狡猾顽抗未作彻底交代外，大多数均以……悔过认罪，交待清了问题。”这表明，建国以后经过很短时间的工作，托派作为组织在大陆已不复存在。二是若干托派领袖人物认识也逐渐有了转变。如托派理论家王文元，1973年写的《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表示：“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与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事后承认：中共……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一个政党”。托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刘仁静，1950年12月21日发表《刘仁静的声明》：“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历史的考验说明刘仁静的态度是真诚的，直到他晚年，社会上有人不能正确看待毛泽东，“他仍然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是正确的英明的”。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他在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拒绝党的批评，搞小组织宗派活动，为维护党的组织原则，开除了他的党籍。陈独秀在政治主张上反对走武装斗争的道路，鼓吹“国民会议”的合法斗争，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陈独秀视为敌人，完全否定。

其一，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陈独秀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监禁长达5年之久。其罪名是：“危害民国”，“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当局

要求他揭发同党,陈义正词严地回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在国民党法庭上,陈独秀慷慨陈词:“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戮力于民族主义革命之共产党。”“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当律师章士钊为陈辩护说:“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不再危害国家时,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诉为准。”许多报刊盛赞陈独秀之举为:“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纪录”。

其二,陈独秀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狱,不再从事托派组织活动。1937年11月21日他给上海托派临委陈其昌等的信中表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1939年初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否定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活动,表达了他和中国托派的不同政治主张:“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却“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这样一个关门主义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其三、陈独秀晚年的言论,虽然有偏激、主观妄言,也有不少非常深刻的见解。如关于苏联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反对民主主义“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苏维埃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不能轻率地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驳“人民愈穷苦愈革命”等,经过半个多世纪世界风云变幻的砥砺,证明其包含有深刻的真理性和预见性,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奇谈怪论”。

普罗米修斯的人间悲剧

近些年,人们针对忽视和贬低陈独秀历史地位的状况,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理直气壮地宣传陈独秀,我是赞成的。然而有些文章和书籍,在颂扬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时,却忽略了陈独秀复杂性的一面。应该看到,陈独秀既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也是个悲剧性人物。不接触这个问题,就不能深刻地认识陈独秀,科学地评价陈独秀。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早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成为五四时代伟大的旗手,此后又举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袖,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辉煌业绩,也为他自己树起不朽的丰碑。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期间,开始也曾取得很大的成绩,如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人运动并在1922年形成高潮;创办农民协会,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然而在大革命后期却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批判陈的错误,处理陈的问题中,尽管有不妥之处(如毛泽东指出的不让陈参加八七会议,并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然而党的历史上许多干部在遇到类似的委屈时,能够顾全大局,妥善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却由情绪对立逐渐转为接受托派思想,搞小组织宗派活动,最终被党开除出去。从党的总书记到反对派,表明陈独秀作为政治家,在素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离开中共以后,陈独秀成为托派领袖。而托派组织上的分崩离析,思想上的混乱与极左,行动上的无所作为,使陈独秀处于十分矛盾而又尴尬的境地。到晚年,不得不远离各种政治漩涡,无可奈何地重新回到“研究室”,埋头于古文字学。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这样的结局,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人们谈起陈独秀的悲剧往往只着眼于陈本人,而陈独秀悲剧的深刻意义,首先在于它折射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中国共

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碰到一系列的问题,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单,革命的主力军却是广大的农民;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资产阶级,而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要建立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在中国,不是患资本主义太多,而是“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语)

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是巨大的考验。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和艰巨的任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做了认真的探索并取得初步的成绩。但由于他们存在着两方面的弱点:一是对中国的国情调查和分析不够,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有片面性。他们很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现实斗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缺乏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个基础谈“阶级斗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处理政治问题,使我们党某些时候,容易在路线和政策上出现随意性和片面性,出现“左”的和右的倾向。作为党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的悲剧,正是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难性

和曲折性,以及党的早期领袖状况的反映。陈独秀晚年曾自负地讲:“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给陈其昌等的信)

陈独秀一生起伏跌宕的命运,固然有历史条件、党的状况、共产主义运动状况、共产国际等多种复杂的客观因素,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是陈独秀内在的某些突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陈氏接触过的人普遍反映,陈独秀思想敏锐而又性情急躁。再加上启蒙时代少数人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而大多数人尚处于不觉悟状态的历史特点,大大加强了陈独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从而形成他的“特立独行”的气质。陈独秀很赞赏易卜生的话: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认为“这是至理名言”。他说:“从广大人民利益来说,当然多数人对,少数人错,但从思想启蒙这个出发点来说,易卜生是对的。”作为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也许“特立独行”是十分可贵的,但作为政治家则往往演成致命性弱点。这是因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思想家常常满怀激情地考虑理想、精神和“应该做什么”,而政治家则要冷静地考虑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可能做什么”。(责任编辑 洛松)

抗战时期陈独秀 每月 300 元生活费的来源

● 刘敬坤

舒芜同志在贵刊 2001 年第 4 期《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一文中,引陈独秀 1941 年 8 月 6 日致杨朋升的信云:“弟(陈独秀)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舒认为,“这每月三百元,是(北大)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津贴’?”皆不详。

据我所知,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贺昌群抗战爆发后,自杭州迁四川乐山从事著作。教育部仍令浙大每月寄贺先生生活费三百元,一直到贺至三台东北大学任教。由此联系到抗战时期,教育部除设立国立中学以及国立大学对学生实行全公费(后改为贷金)外,又设立多个战区教师服务团(至少有 9 个),登记收容自各地流亡到后方的中小学教师,按抗战前原薪供给生活费。

陈独秀当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以北京大学名义每月供给陈生活费 300 元,这和浙大每月供给贺昌群生活费 300 元同一意义。看来这是教育部安置流亡到后方大、中、小学教师的政策。每月 300 元的薪俸,是抗战前上中级教授的待遇。

革命信念与 我的风雨人生

● 刘 英

我是1925年在湖南长沙入党的，那时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没有想到一转眼我已是96岁并有76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值此建党80周年之际，回顾我这一生在党领导下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禁不住脑海里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的历史，然而同时也是一部历尽磨难的历史。只有她，能不断地战胜磨难，千锤百炼，显示其无比的光辉。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能否在各种艰险环境下坚持不动摇，也是有无真正党性的实际考验。

回想起来，我所经历的党史上的第一次大的磨难就是大革命的失败。1925年我入党时大革命正在走向高潮，处处是一派革命气象。可是哪里料到才两年多，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失败了。从我所在的长沙到我后来去过的武汉、上海，到处是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

那时候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没有经验，广大干部、党员对这次革命失败事先都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拿湖南来说，实际上在反动派已经准备对革命下手的前几天，省委

才仓促地作出应变部署。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的部队一夜间袭击了省党校、省工会、省农协等近十处公开的革命机关，紧接着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布告就贴满了整个长沙城，革命力量顿时被打散了，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时我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像孩子失去了母亲。为了找到党，我不顾一切，冒着极大的危险在长沙街道上“碰”，终于很快同组织接上了头。这年10月，湖南省委改组，王一飞担任省委书记，我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

部长。然而形势在不断恶化，改组后的省委才开展工作两个月，就遭到一次大破坏，有六位省、市委领导和十几位同志被捕。省委就只剩下了组织部长、秘书长和我三人。大家商议决定由我扮成学生模样，紧急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出远门，形势又是那么险恶，此行是凶是吉，很难逆料。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日夜盼望的党中央。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



刘 英

领导同志接见了，当面听取了我对湖南情况的汇报。汇报完成之后，中央领导考虑到湖南的形势太险恶，我又是一个女同志，要留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但我坚决提出仍回湖南工作，记得李维汉听了我的要求后就对我说：“你是打了铁颈根？就不怕杀头！”确实那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胆子。

大革命失败，我算是一个幸存者。在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多少个优秀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王飞、郭亮、林蔚这几位和我曾经朝夕相处过的省委领导，他们是如何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的。如今只要我想起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他们在那个黑暗时期临危不惧、舍身忘己、关爱同志的情景，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敌人是十分残暴的，他们为了摧残整个湖南工运，在杀害了郭亮这位当年湖南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后，还把他的头颅悬挂在长沙狮门口城头上示众。

可是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尽管反动派天天在杀人，斗争却从未止息。要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究竟凭什么坚持斗争，应该说凭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信念。我们每个党员在入党时不都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吗？虽然那时候我们大都很年轻，但是头脑里都坚信这个真理，正如烈士夏明翰的诗篇中所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我所经历的党史上第二次大的磨难，就要算红色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了。1929年组织上派我到苏联去学习，一去就在那里呆了将近四年。在学习期间就知道国内不但发展了自己的红军，而且有了好几块大的红色根据地。1932年返国时组织上通知我回中央苏区，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我听了十分高兴。1933年6月初我到苏区首府江西瑞金时，正值根据地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整个苏区处在鼎盛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一大片根据地，包括江西、福建、闽赣3个省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到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被称为红色首都的瑞金，除了党政机关外，还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印刷厂等。这同五年前我工作的长沙

相比，简直就是天堂了。

然而好景不长，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到了第二年春天，反“围剿”的军事形势不断吃紧，根据地的面积一天天缩小。记得4月进行了一场广昌大战，广昌是根据地的北大门，李德、博古亲自到前线指挥，保卫战进行了17天，广昌最后还是丢失了。从此敌人的进攻就深入到根据地内部，终于迫使我们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那样一个好端端的根据地就那么快地丧失了，人们感到无比的痛惜。从我个人来说，那时还没有认识到上面有军事路线的错误，但是对于长征开始那种大搬家式的转移，我是产生过一些想法的。因为长征开始有一段我在中央机关纵队三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梯队当时的任务就是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根据地的家产。上面布置要求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搬，结果是从兵工厂的车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的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真是大转移成了坛坛罐罐“大搬家”。这就首先给我们三梯队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那时候的运输哪有什么汽车啊，再说即使有汽车也没有走汽车的路啊。牲口也很少，主要是靠人，肩挑背扛，而且是夜间行军，又不许打火把。当时正值深秋，南方细雨绵绵。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头顶着雨水，抬着那么笨重不堪的家伙，高一脚矮一脚地踩在烂泥巴的土路里，整个队伍一夜才向前移动五、六里地。可以想见那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行军啊！队伍减员严重，临时扩充也很困难。更令人困惑的是队伍最后究竟要走到哪里去谁也不清楚。所搬的这些东，有的固然很重要，但是有很多是很难说清何时才派得上用处的，花那么大的代价搬运，影响整个部队前进的速度，究竟有无必要？！

众所周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被动局面的是1935年遵义会议，不过这次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下面的人不知道。我是在会议召开后20多天，在云南扎西听张闻天做传达报告时才知道的。他那时已经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的

报告着重讲了根据地没有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党在军事方面犯了错误，这就打消了许多同志很长一段时间积蓄在胸中的困惑。特别是听到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过问军事的消息，会场上全体都为之振奋。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传达报告批评了“大搬家”的错误，说我们转移地区是为了打仗，不是避难搬家。因为前一段行军路上，我就向走在一起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反映过“大搬家”的问题，他们都听得很仔细，并且心情都很沉重。因此我在听传达时就想，他们在酝酿这次会议中肯定也研究了我所反映的情况。

那时我为什么能够很方便地向他们反映情况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在苏区一年多同他们接近比较多，张闻天（那时叫洛甫）、王稼祥在莫斯科时我早就认识，他们当时都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也都给我们“劳大”的学生讲过课。毛泽东和我是同乡，过去早就知道他，但是不认得，到苏区后经过张闻天当面介绍，终于认识了这位大老乡。这时毛泽东、王稼祥，一个在养病，一个在养伤，住在一起，离我办公的少共中央不远，因此空闲的时候常去看他们，那时候大家都比较随便。当时毛泽东还正是受当权的博古他们排斥的时候，因此就有人提醒过我，说此人是“右倾”，你还是少接近他一点好，我没有理会这一套。至于张闻天虽然当时也是掌权的，但我发现他同博古不一样，那时他对毛泽东就很尊重，认为他打仗很有一套，也常到毛这边来坐，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这里还要说到的是，在苏区也许是有某种缘分吧，我通过张闻天认识了毛泽东，没想到后来长征中毛泽东竟然又在我和闻天之间充当起媒人来了。在遵义会议后我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两个在场，毛、王两人就常常一唱一和，有正经没正经地把我和闻天拉扯到一起。当然也不是强拉硬拽，闻天在这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了意思，而我虽然过去接触中还没有往这方面去想，但也对他并无恶感，印象中张闻天为人忠厚，理论水平高，我打从心里尊敬他。这样，在他们二人的撮合下，通过工作中的一段直接相处，建立了

感情，后来终于走到了一起。不过那时我们之间可没有现代人想象的那么浪漫，要知道，在那种艰难条件下长途行军，每到一地都疲惫不堪，哪有那份闲情卿卿我我呵。再说，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对于女同志来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简直是一场不堪想象的灾难。因此，我总是克制着自己，把爱的种子埋在心里，我们的结合是在长征到了陕北，红军找到了落脚点之后。

如今长征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了。这场由于“左”倾错误导致的大转移，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磨难，但它对于长征中走过来的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却又是一次极大的意志磨炼。1984年一位美国记者跟我开玩笑说，是什么风把你这个小个子刮到陕北的？这位记者那一年为了写一本长征的书，乘汽车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实地考察了一遍，因此他对红军在那种条件下完全靠徒步走完这样一条漫长的路，赞叹不已。今天作



1999年刘英在福建森林公园

为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我可以告诉人们的是，那时候我们靠的主要就是一股子顽强的精神，正如闻天在抗战时期对来延安的青年讲课时所常说的，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在于我们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即使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

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得我们不得不长征，然而通过长征中的历史转折和错误教训的吸取，我们党变得成熟了起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中央随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路线，推动了全党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这次会议就是在我们家住的窑洞里召开的。在新的政治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就开创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崭新局面。

我所经历的第三次大的磨难自然就要算“文化大革命”了。但从张闻天和我两人来说，实际遭到的磨难时间比“文革”时间还要更长，如果从1959年庐山会议闻天遭受打击，我也遭到株连时算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实际是17年的冤案与厄运。这次磨难起初主要还是精神上的，闻天在庐山会上发言招来的是“右倾”、“反党”两顶帽子，后来批判时更是升级为“里通外国”。闻天对我说，如果说他反对“三面红旗”，那还只是个观点问题；说他“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批判闻天的同时，就在外交部的会上逼我“揭发”，而我的回答根本就满足不了他们那些无理要求，于是他们就说我划不清界限。最后还是我写信给毛主席，主席批了对我的处理要与闻天“有所分别”，这才没有戴上“分子”的帽子，但还是划了个“严重右倾”。到了“文革”中，那种批斗就不仅是精神上的折磨，而且还加上肉体上的摧残。批斗高潮过后，两人又被分隔拘禁了532天，紧接着被遣送广东肇庆度过了长达6年孤寂的流放生活。最后，被解除监禁之后落脚江苏无锡的第二年，即1976年7月1日闻天就离开了人世，这一天距“四人帮”垮台只

差了95天。

在这17年的漫长岁月里，除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之外，没有人敢接近我们。正如闻天所说，在他身边能够说得上话的，就只有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我。但是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对党也都没有丧失信心。闻天在他弥留之际提出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解冻后退还的全部工资和积蓄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并且难过地对我说，这么些年没有能为党工作，他含着泪在自己的床前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协议。

我还要说的是，在我们两人蒙冤的日子里，闻天无疑是首当其冲，所受的折磨也比我要重得多；但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却比我要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对个人所受的打击，一不抱怨，二不后悔。他在逆境中写下的几十万字笔记文稿，全都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每当他在专心探讨问题时，我见他几乎忘掉了一切，似乎什么冤屈都不存在，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去年纪念闻天诞辰100周年时有人问我，闻天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四个字：追求真理。他的确是把对真理的追求看得高于他的生命。在肇庆他年逾古稀不顾重病奋力写稿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深感他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因此在闻天去世后，我心里惦记的头一件事，就是保存好这批笔记文稿。在接到中央决定为闻天平反的通知后，我向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请求，就是发表他的文稿。当我后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闻天两篇肇庆文稿时，我是何等的欣慰，闻天坚持的真理终于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定。

历尽严冬方知春日暖。我作为一个经历了历史上三次磨难的幸存者，要特别感谢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抚今思昔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天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广大党员不要忘记过去，深刻认识到今日的胜利来之不易，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程 度）

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一九七六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追记

● 汪东林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成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长期在政协学委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主要负责同大家联系，作学习记录，以及整理简报等工作，因此，同这些非中共的知名人士，接触密切且时间较长。他们的言谈举止，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记述下来，无疑是那段不寻常历史史料的一个侧面。

因时间跨度大，又受篇幅所限，这里仅就1976年的情况作为举例。那时学习组成员名单上有近30人，重要的学习会出席的可达20余人，经常出席的仅15人左右，从来没有到齐过。

那时，主持会议的召集人有五位，即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程思远、王克俊。按规定是五位召集人轮流主持学习会，实际上最经常当主持人的是于树德和王芸生。当时于、王、赵是全国政协常委，赵朴初却因宗教方面事务较多，出席学习会较少；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先生归来，翌年便赶上“文革”，一晃十年没有在政协安排职务；王克俊是全国政协委员，非中共的政协副主席，当年是傅作义将军手下的要员（从机要秘书升到秘书长），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确实有功，但与前几位召集人比起来，他自认为资历声望均不及人，加之健康欠佳，所以有事多推于、王二位。

召集人于树德被称之为“忠厚长者”

于树德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是李大钊的挚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曾出席由列宁主持于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会议，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他是在国民党高层担任重要职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少数著名的共产党员之一。他曾作为国民党中央大本营的特派员北上河南调停重大政治纠纷，还同时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他与周恩来结识，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周恩来留学日本，就曾得到于树德的资助。

于树德作为学习组的第一召集人，他平时的职责是主持学习会，启发甚至指名他人发言，而自己则经常是三言两语，凡属小组总结性的发言他都推给另一位召集人——曾任《大公报》主笔几十年的老报人王芸生。

王芸生是老报人，他学识丰富，思想敏锐，手勤脑勤，记忆力好，凡对学习组的各种传达或向上汇报，于树德一概推在他身上，于老自己甘当补充发言的角色。组

员们对王芸老谈的学习体会和思想分析,特别是有关国际问题的发言,都听得津津有味;凡遇学习会冷场,总有人(通常都是赵君迈)提出请王芸老讲讲国际形势,尤其是日本近况(王是中日友协副会长,中日关系问题专家),他也当仁不让,侃侃而谈,一讲就是半个小时,有许多是报刊上没有的背景材料。于树德对此也打心眼里佩服。他比王芸生年长8岁,却常以“王芸老”尊称之,并且多次在全组会上说:“我这个组长,就是召集大家开会,听大家挨个发言。学习中的难题,各位自己解答,请王芸老解答。我年迈迟钝,头脑昏沉,看了后头忘了前头,相信各位都了解我,也不会苛求于我了。”

这些当然是于树德的真心话,但据我做20年小组秘书的长期观察,应付复杂政治局面的本领,于树德要远胜王芸生一筹。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所谓政治学习,大多是搞政治运动,除了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还不时搞大批判,主要批判对象自然是全国著名的“反面教员”、本组成员梁漱溟。秉性正直、待人忠厚、大事不糊涂的于树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处理如此棘手的问题,常有惊人之举,这正是大家暗中敬佩于树德的原因所在。

自1962年至1976年,政协直属组集中批判梁漱溟规模较大、时间较久的有两次,还有一次是梁自己“跳”出来“发难”,语惊四座,却因受上头保护而未遭批判。这三次都是于树德主持的小组会。第一次是1965年关于梁漱溟提出的“科学道德之事”的大批判。第二次是1974年以政协直属组为主战场开展的“批林批孔又批梁”长达半年至一年。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样旷时日久的大批判,作为主持人的于树德不仅从未在联组批判中发过言,而且在小组的发言也只是三言两语,常常是插别人发言的空隙说几句。

于老的家离政协礼堂很近,他多年来虽有专用车,开会却从来是步行来,而且常常是第一个到达会场。我是工作人员,因此常常有同于老会前

私下交谈的机会。那时我才20多岁,正式开会我无发言权,会下也留意不乱说话。在1965年批梁开始不久,梁的态度“极坏”,有一次会前,于老忽然问我:“你上大学读过梁漱溟的书吗?”我答:“没有,但我看过50年代中国科学院批判他的文章,也没有细读。”于说:“梁漱溟这样的人,你们年轻人更理解不了啦。他少年得志,五四运动时就在北京大学教书,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轰动一时,我是50年前就认识他了。多年来,什么事他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从来不轻易随从别人,连毛主席他都敢在大庭广众前顶撞(指1953年),别人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我算是服了他了!”“那么,我们小组的批判怎么办?”我脱口问道。于老迟疑了一下,说:“批判批判,肃清流毒!对他本人能不能认错,我缺乏信心。”此外,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无论是1965年,还是1974年,也无论是在小组召集人会议上,还是在向政协学委会(后改称学习领导小组)汇报时,主张对梁漱溟的批判“打退堂鼓”的,第一个便是于树德,他的话是:“梁漱溟朽木不可雕矣!他这个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就我们直属组这几个人能有本事说服他认错?我看算了,还不如把他放在一边,我们自己多学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交流交流学习心得更好。再批判下去,对我们不合算,他倒不在乎,反正耳朵不会起茧,闷头听就是了。”对于树德这种态度,上边虽也有人说他“糊涂思想”,甚至上纲为“搞阶级调和”,但政协直属组的



程思远与汪东林(左)在一起

绝大多数组员却非常赞同。有人私下说：“还是于老‘和为贵’，有忠厚长者之风。”

所谓有一次梁漱溟“跳”出来“语惊四座”而未受批判，也与于树德有关。那是1970年军代表正在政协机关内部搞运动，抓“大联合”、“斗批改”之后，大部分干部已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其时中央正酝酿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还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上边交代要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座谈、讨论，征求意见。直属组主持人便是于树德。1970年林彪、江青肆虐正盛，出席学习会的政协委员们诚惶诚恐，只说《宪法草案》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武装头脑，改造自己，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对个别文字提出一点修改意见。主持人于树德以为任务就这样完成了，但他注意到惟独梁漱溟没有表态，出于礼貌，于老问梁先生“还讲不讲”，梁漱溟竟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纸，接过话头讲了起来。他说：

“各位都说《宪法草案》好，我说也不错，文化大革命屈指数来五个年头了，现在有了《宪草》，要召开四届人大，我们没有到政协开会也有五个年头了，这还能不是好兆头？不过我觉得开了好几次会，诸位都没有提什么修改意见。我反复看《宪草》，也反复考虑，既然召集我们来开会，我们如真没有意见尚可，如真有意见而一条也不提，是否有负上级对我们的信任，或者说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据此，我以自己的浅陋之见，提两条供当局修改时参考。第一点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其重要之点就是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普遍意义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决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外国没有，我们也可以有。第二点，是新宪草比老宪法条文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国家主席不可不设，至于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选，不是一回事。现在的新宪草偏偏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

不知为何？”

梁漱溟这两条意见，真个语惊四座，短时间的沉默后，便有人提出这是“恶毒攻击”的言论，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批判；也有人说，这种“恶攻”言论要往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专政”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正巧此时军代表不在场。怎么办？于树德不动声色地说：“梁先生的意见，我们负责记录好原话，向上反映，是不是要在小组开展批判，我们听候上级的处理意见再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梁先生在这里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大家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向外扩散，包括自己的家属，谁扩散责任自负，后果自负。”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梁漱溟也连声说：“我说的话我负责，我负责！与诸位无关，无关！我听候上级处理！”几天后的学习会上，军代表来传达：一，上级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所以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二，个别人因为思想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当然凡属反动的言论都不许扩散。于树德听罢松了口气，立即说：“我们就按上级指示办，不纠缠，不扩散。”这个“上级指示”的“上级”是谁？军代表没有说，大家也不能问。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知这是当时周总理办公室发给政协军代表的电话指示。

学习内容突变，“怀念周总理”持续一月之久

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学习，按规定每周二、五上午两个半天。那时所谓学习，就是念文件，读报纸，搞运动。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告一段落之后，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才转入学习马列著作，但为时不久就风浪迭起，至同年底学习内容转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则已经开始发动暂不点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许多人心情压抑，闷不敢言，反映到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会上，老人们的发言只能是照本宣科，言不由衷。

1976年1月9日，是一个令国人无法忘怀的日子。清晨传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全国沉浸在哀伤之中。因为这天是星期二，我们的法定学习时间，我大约8点40分左右到达政协礼堂第五会议室时，已有10余人先我而来。学习召集人于树德和王芸生特地同我握手，并说已商妥今天学习会暂停学习讨论批判“三

项指示为纲”的文件,改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话音凄然发颤。待另外三位召集人赵朴初、程思远、王克俊相继到达后,于树德又为改变学习内容事同他们打招呼。9时正,平时说话轻声轻气的于树德忽然提高了嗓音,缓慢而有力地说:

“诸位,大家都听到广播了。今天是中国历史上不幸的日子,它宣告了一个历史伟人离我们而去!我今年83岁了,从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至今,一生经历过若干悲痛的日子,但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心情这样沉重(哽咽)……(然后又大声说)现在,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我们心中所敬爱的人——周恩来同志的病逝默哀三分钟!”

20多位老人在沉痛中默默地站起来,杜聿明、宋希濂、赵君迈、爱新觉罗·溥杰用手帕擦着泪水;直属组仅有的两位女委员董竹君、秦德君则是用手绢紧紧地捂着嘴,生怕发出哭声。申伯纯老人终于按捺不住哭出声来,顷刻间爆发了几十位老人的一片号啕。

在悼念周恩来的发言中,于树德说:“我认识恩来,可能在诸公认识他之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应毛主席、周恩来之邀从南方来到北京,许多熟朋友在北京饭店欢聚。出我意料的是,恩来同我见面,一阵热烈握手之后,竟乐呵呵地对我说:‘永滋(于树德字永滋),我还欠你300块大洋的债务呢。要算上利息,这笔债我个人现在也还不起呵。怎么办,分期偿还,还是免去利息?’哪儿来的什么债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在座的朋友更加不知所云。周恩来笑笑接着说:‘你这个债主可以忘,菩萨心肠,就当做了一桩好事,可我这个负债者,亦即是受益者却一直没有忘啊!’直到恩来提起30年前我们一道东渡日本留学的事,我想了起来:那是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天津,我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并毕业于该校,那时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五四运动爆发前天津市学生的革命运动已经搞起来了,我同恩来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后来组织‘新中学会’,关系就更为密切。那时他的名字不叫恩来,而叫翔宇。至五四运动前夕,我决定赴日本留学,经多方筹措,自备了300块大洋的费用,恩来也想赴日读书,但他那时家庭经济来源已中断。在我临行前,法政学堂决定给我一个公费留学生的名额,我立刻想到了周恩来,便跑到南开中学,对恩来说,‘学校给了我公费生资格,我自备的300块大洋给你,我们便可以一道去日本了。’这样一件事,30多年过去了,身为总理的他

还惦记着,实在令人感动。”

学习主题变为悼念和追思周恩来后,一改过去学习中发言互相“谦让”的风气,争相发表自己的感言。申伯纯以大量事实讲“周恩来的光彩照人”;程思远诉说为安排李宗仁回国与周总理的几次难忘的会见。

在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前的一次学习会上,未曾发言先老泪纵横的杜聿明说:

“自1月9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噩耗传出至今,我度过了将近一星期平生最痛苦、最难受的日子,真正是度日如年啊!我在美国的大女儿、大女婿也来电深表悲痛并劝我二老节哀。但是难呵,前思后想,就是跳不出‘悲痛’二字。回想我个人的一生,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痛苦的日子,那就是在淮海战役中,我指挥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全军覆没,自己也成了俘虏。那时,我曾想一死了之。自杀不成,内心也已万念俱灰,痛苦无以复加。但后来回顾这段日子,这痛苦既是自己反动立场未改变的驱使,同时又是经过一段痛苦思想斗争走向新生之路的开端。因而那时的痛苦与今天包括我在内的全国人民痛失周总理的痛苦,是完全不可伦比的。因为周恩来这样的现代中国的伟人一旦失去,是无法弥补的,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岂是你我个人去留存活的私人之事?因此今天这种痛苦,才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最深的一次痛苦,我无力以言语来形容(哽咽)……”

接着,他回忆起青年时代考进黄埔军校的情形。他说:

“那时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我和在坐的宋公(希濂)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诸如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重要政治课,才得以开设或加强。周恩来那时的工作作风就是事必躬亲,认真负责,而且态度谦和,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因此深受黄埔学员们的敬重。在黄埔军校这段难忘的岁月,周恩来名副其实是我的恩师。至于后来大革命失败,我们分道扬镳,我竟投靠了蒋介石,历史证明是我走错了路,是我背叛了恩师周恩来的教导。出乎我意料的是,在30多年后的1959年12月14日,周总理接见我和宋公、王耀武、陈长捷、邱行湘、曾扩情、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爱新觉罗·溥仪等第一批被特赦的战

犯，周总理一开头即亲切而风趣地说：‘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除溥仪外），我和文白（即当时陪同接见的张治中）都曾经是黄埔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学生后来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也是有责任的啰！’我一听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责任明明在自己，怎能是周总理这样的老师呢？不等多想，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殊途同归，大家又走到一起来了！’接着，周总理亲切询问过每人的家庭情况，过后开始了长篇谈话。当时我们都作了笔记，事后作了核对，大家公认宋公的笔记记得最全、最好。我不想在这里全部宣读，只是摘读一部分，请大家听听，可以从中看到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和远大目光，看到他的那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周总理首先谈到民族的立场和爱国的立场。他深情地对我们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 120 年的斗争，中国人民才翻身作主人，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这一事实是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的。溥仪先生可以证明，现在的国家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 20 多年也没有搞好，这一点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证明。今天的中国，6 亿 5 千万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真正在国际上有了地位，有了自己的发言权。祖国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炎黄子孙，不爱这样的祖国还爱什么？’周总理接着说：‘以民族问题为例，旧中国总是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些民族。今天溥仪先生在座，宣统年间，我十二三岁，生活在沈阳，那时满族人气焰很高，后来清朝亡了，满族好像也亡了，许多满族人改名换姓，不敢说自己是满族人。而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了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平等的政策，他们又主动申报自己是满族了。这说明今天的新中国，才是各民族人民团结统一的民族大家庭。’

“论述民族的立场时，周总理还说到蒋介石和台湾问题。他说：‘除了溥仪先生，各位都做了蒋介石的



于树德

解决。这表明，蒋介石虽然反动至极，但他也有民族的立场，他也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要这民族的立场不变，台湾问题最终就有可能也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包括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爱新觉罗·溥杰的发言，也是有代表性的。溥杰平时发言的习惯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不带表情；要么是盯着笔记本，边翻边说，一口气说完。这次他一反常态，几度哽咽得发言中断，摘下眼镜，擦眼眶，擦镜片。他说：

“没有敬爱的周总理，就没有我这个人，我这个家，我这个爱新觉罗家族，我是个有罪的人，且不说前半生剥削人民，更在伪满洲国成为民族的罪人。因为有了共产党的把罪人改造成新人的伟大政策，我才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后半生……”

“我是第一个被允许与家属通信的在押战争罪犯。日寇投降时，我的妻子爱新觉罗·浩（嵯峨浩子）带着两个女儿去了日本。我在监狱里改造，虽然切不断思念她们的念头，但心却死了——那就是认定今生今世不可能与她们团聚了，这是自己罪有应得。1955 年春夏之际，我的 17 岁的大女儿慧生从日本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我的父亲久无音讯’，‘我们全家都想念他’，希望能许可她们与父亲通信。周总理批准，把这封信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我的手中，并指示也应‘允许其他战犯与家属通信’。我那颗死了的心

几十年部下，我也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在黄埔，在北伐前期，在抗战初期。各位都熟知和了解蒋介石其人其事，他现在败退在台湾仍在高喊‘反攻大陆’，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头脑可谓花岗岩般顽固不化。但他反对‘台湾独立’，也不赞同外国势力‘托管’，鲜明地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当然他主张的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是他反攻大陆‘成功’后仍由他继续专制独裁的那个‘中国’。然而恰恰是主张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这在中国共两党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一致对外的，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民自己来

从此复活。

“1959年12月，我的哥哥爱新觉罗·溥仪第一批被特赦释放，给所有在押战犯的前途带来了光明。我的妻子闻讯后比我还焦急，以为我获特赦的日子也一定不会远了。她因此写了一纸呈文，寄给中国政府和周总理，要求在丈夫获赦后前来中国团聚并定居。又是周总理为我这位共同生活了8年（1937年4月结婚）并生育两女，又苦守了16年的妻子的切切之情费了心。在1960年11月28日我被第二批特赦之前的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理曾几次会见溥仪，并把包括我的七叔载涛和兄弟姐妹在内的爱新觉罗家族都邀到中南海周总理家里吃午饭，一方面关怀比我早特赦一年的溥仪的工作和生活，一方面做溥仪的思想工作，让他不反对我的妻子回中国团聚并定居北京。这是因为明察秋毫的周总理，他了解我和嵯峨浩子的婚姻在历史上是‘政治联姻’，是日本人策谋对付溥仪不育搞王位传‘弟之子’而部署的。溥仪几十年来一直反对这桩婚姻，尽管事过境迁，世事大变，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反对嵯峨浩子来中国定居。周总理竟那样耐心而细致地做通了我的哥哥溥仪和家族的思想工作，并嘱咐我在特赦后立即给日本发信，邀请妻子和女儿来中国，回到爱新觉罗家族，在北京定居，共享天伦之乐。我个人为此很动了一番感情，多少次泪流满面。请问，这哪里是一国的总理呢，不分明是再生的父母吗？”

学习组的成员中还有法学家陆殿栋，他的夫人是广为人知的史良女士。陆精通法律和英语，解放前也在上海当律师，解放后随史良到北京，任外交部条法司（50年代称条约委员会）法律专员。他几乎每会必到，但很少发言。该组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数次批判梁漱溟的高潮中，他也仅仅是最后一个发言表态而已。他在表态中不止一次地说这样的话：“梁先生是在旧中国学界政界均享有盛名的人，但我没有读过梁先生的书，此所谓‘隔行如隔山’吧，梁先生的哲学思想对我来说真是高深莫测，因此我无能力对梁先生的思想进行深刻批判。我每次都到会，一是听取许多同仁的高论，我也从中接受教育；二是期望梁先生在大家的帮助下能有所转变，有所进步。但梁先生总是使全组同仁失望，也使我失望，我对此深表遗憾！”当时上边对全组成员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作政治分析，每次都把陆殿栋排入“同情梁漱溟”、“划不清

界限”之列。陆去世若干年后，梁漱溟同我提到陆时说：“陆先生是位正直的学者。”

1月16日上午9时，即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周总理追悼会的第二天，陆殿栋在小组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取出笔记，操着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沉重而缓慢地说：

“各位的发言，都使我心绪难以平静。好多天来，我夜不能眠，多次半夜起来断断续续地准备我这个发言。”他说，他一想到周总理的辞世便心潮翻滚，不能自制。周恩来的大名，他自然在解放前就如雷贯耳。但直接接触，是在解放后他奉调到外交部任专员之后。他讲到周总理那时兼任外交部长，在工作繁忙中如何找他们听取有关外交法律方面的意见；又讲周总理如何关心人，他徒步上班的事被发现后，总理又怎样关照他。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陆殿栋讲到一件事，以小见大，足以表明周恩来这个伟大人物的平易近人时，突然口齿不清，语言不能连贯。主持人于树德和我同时发现这一情况。于老说：“陆先生，你不要太激动，休息一会儿再说。”陆开始还说“没事，没事”，掏出手绢擦额头上豆粒般的汗珠，救护车赶来抢救时，陆先生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明确诊断，是脑溢血。神情紧张、脸色发白的史良大姐赶到现场，只是急切地问：“人怎么样？怎么样？”她靠近抢救的临时病床，大声叫唤：“殿栋！殿栋！”已陷入深度昏迷的陆殿栋已不能作答了。史大姐欲哭无泪，浑身发抖。停一会儿才说：“他好多天没有睡好觉，同大家一样的心情。昨天他不听我的话，不服用安眠药，今天果然出事了……”

遵照史良大姐的意见，救护车直驶北京医院。虽经全力抢救，陆殿栋始终没有醒过来，于当天晚上在北京医院逝世。

在隔天举行的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主持人又提议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但这次不单是为周总理，也是为因悼念周总理而逝世的陆殿栋委员。

于无声处，程思远、 杨东莼“开炮”质疑

时至1976年3月上旬。邓小平同志自1月15日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后，就一直没有露面。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的运动密锣紧鼓，“文件”、“社论”一个接着一个，大道、小道的“消息”也

越来越多。这乌云滚滚风满楼的局面,即便是经历了半个世纪政治生涯的政协直属组的成员们,也感到忧心忡忡,困惑越来越深,学习会上,除了拿“两报一刊”社论和“梁效”之流的文章照本宣科外,发言者寥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场。3月中旬的一天,平常很少发言的程思远忽然大声说:“于老,我已反复想了好些天了,我思想上有难题求教于诸公,下次学习会我发言。”于树德连连表示欢迎。

程思远不说则已,一说惊人!他语气有力而充满忧虑地说:“这些日子,有一个多月了,对新近开展的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处于非常困惑、思想紊乱的状态。有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更有实际问题,我都迷惑不解。

“在理论上,有个问题我感到糊涂。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党内有思想斗争,这毫不为怪。但党内思想斗争是否会一下子扩大到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呢?是依据哪些条件而由思想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呢?一个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提‘三项指示为纲’,而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呢?我实在弄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三项指示为纲’里的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我过去认为很好,现在的‘文件’、‘社论’又告诉我,‘三项指示为纲’错了,而且是严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错误,但是,‘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其要害究竟是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思想弯子不容易转过来。

“第三,毛主席、周总理在去年四届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机构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别是自周总理病逝至今,明确开展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风起云涌,再度陷入混乱。像我这种不了解内情、心中有事放不下、神经又脆弱的人,真是经受不了啊,我的血压也由原来长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恶果啊!我家小孩子从外边抄回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一百例》’,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纲领?我还听来人讲,最近四川省大字报上街,炮轰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点了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名,而且指名邓小平是后台,提出再度打倒邓小平。我听到这些消息,

很不理解,心里非常难过!”

程思远说到这里竟掉下眼泪。

在当时的情况下,程思远如此直言不讳,是何等的犯忌啊!不少人为程思远的发言担忧,生怕惹出什么是非。又见休息时程一个人在政协礼堂一楼大厅里来回踱步,心事重重的样子。在当天学习会结束时,于树德既坦率又明确地对全组成员说:“程思远先生今天的发言提出的问题,所表示的困惑,我看可以理解。最近几个月来的政治学习,形势发展变化如此迅速,请问在座诸公有几位跟得上趟?又有哪几位能回答清楚程公今天提出的这一个问题?我以为,我们是内部学习,讲自己的心里话,提出自己解不开的问题,是允许的。我们能解决的,自己解决;我们思想认识跟不上,确实解答不了,那就向上反映,请高明的理论家帮助我们解答。当然,我们在学习组会上内部说的话,也不必到处随便外传,免得被人误会,引火烧身。”

真是无独有偶。在此不久,杨东莼又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质疑。

在1976年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四人帮”御用文人炮制了一系列批判的“靶子”,其中最奇特的一个叫“唯生产力论”。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阶段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基础,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则一切社会革命的发生便无从谈起。因此,“四人帮”也知道直接批判“生产力论”是极易露出马脚的,于是便炮制了“唯生产力论”这一假命题,煞有介事地发表长文,气势汹汹地进行批判。

杨东莼是我国最早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之一,1921年即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期从事教育、宣传和工会工作。解放后任广西大学校长、武汉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作为一个秉性耿直而又学识高深的学者,对当时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不理解。在5月间的一次政协学习领导小组会议上,他首次提出:“当前的这场学习运动,是中央提出的,我们应该执行,要想点办法把学习搞好,使参加者真的有所收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在学习中发现問題,提出問題,并经过認真的学习、讨论,解决这些问题。最近以来,我认真阅读了各种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批判唯生产力论’中的‘唯’字究竟从何而来?我自知才疏学浅,但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是自年轻时代至今一直没有间断。据我的记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这个‘唯’字。如果有,这是一个大发现,应该给发现者记一大功;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是那一位写文章的秀才杜撰的。而我认为,如果是杜撰,那是很不严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不尊重,会造成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对这个问题,我今天只是提出来表示质疑,我还没有认真去查阅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我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打算认认真真去研究。我还十分愿意求教于在座的诸位和各学习组的学友们。”主持学习领导小组的组长问他能否作一番准备到联组讨论会上作专题发言,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好,我接受这项任务。”

到7月中旬,经过充分准备的杨东莼要作专题发言了,到会的人空前踊跃。杨夹着讲课的大皮包,带了许多书本资料登上讲台。其时气候炎热,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连个电扇也没有,讲者摇着大纸扇,仍不停地擦汗,听者也同样以扇子驱热。然而杨东老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居然全场鸦雀无声,无一人进出,这情景也是空前未有的。

杨东莼先讲5月间他在学习领导小组会上问题的提出,然后转入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都提到了。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无例外地高度重视“生产力论”,把发展生产力看成一切社会变革的主要依据和原动力。最后,杨东莼郑重而严肃地说:“我为了查阅这些经典著作,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我的水平、能力和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但仍无法证实那

个‘唯生产力论’的‘唯’字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也进一步推论,是否是现在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已成了‘敌人’的前党中央领导人有过这种‘唯生产力论’的提法?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第一,我本人为此也查阅了许多有关文件和讲话,还询问过若干老同志;第二,翻遍所有报刊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文章,均不见指明这‘唯生产力论’的出处,这也反证不是诸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创造发明。如果是他们,恐怕早已用大号字标出,而用不着打这个哑谜,让我这个书呆子去花这番苦功夫了。由此可见,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仍认为这‘唯生产力论’,是某一位写文章的秀才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这种‘发明创造’其目的何在,我不想多加推论。但我认为,即便是写文章,搞研究,这也是乱设命题,制造混乱,以假乱真,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做学问的人所不齿的。果真如此,我深表遗憾!乃借此机会求教于在座的诸公。天气太热,你们辛苦了,谢谢!”杨东莼的这番宏论,虽在当时200余位听讲者中颇得人心,但绝不可能投当时领导者之所好。紧跟着来的是上级要求对杨进行帮助并消除其影响的指示。但这个指示即使在杨东莼所在的小组,也未能认真贯彻。在政协直属组的反映是:“这个理论问题太深了,我们不是学者,要分析批判,难以胜任。”时间拖了不久,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学习会暂停,计划对杨进行的“帮助”,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是粉碎“四人帮”的普天同庆;再后来便是拨乱反正,把长期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了回来。

(作者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洛松)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及近年合订本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我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 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电话:(010)64072452 邮编:100007

1996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何功伟其人其事

——写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前夕

● 于光远



(一)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今年4月3日到5日,我访问了湖北赤壁。同行者中有一位原《方法》杂志编辑李可同志。当他了解到1937年11—12月我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委(不久就改称湖北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农委)委员时,告诉我与我同时担任农委委员的何功伟是他岳父何功凯的兄长。他还告诉我,何功伟和李锐是好朋友。何功伟在1941年英勇就义前,曾写给他的父亲两封遗书,李锐读后认为此信写得极好。不但内容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文字也很动人,十分出色,可以作为范文编进中国语文教科书。

李可对我讲起何功伟,引起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我从太原到武汉,要我做“黄河以南”党的青年工作——主要是“民先”工作。到武汉后,我才知道在抗日战争之前,湖北的党组织由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暂时不存在了。1937年8月,参加过这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的杨学诚,从沦陷后的北平来到自己的家乡湖北,就以党的名义在武汉活动。9月党中央派郭树勋(后来一直用郭述申这个名字)前来正式建党。他到武汉后在汉口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我和杨学诚都是这

个委员会的委员。同年11月在武汉建立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我被任命为省工委的农委委员。省农委书记是李华,委员只有我和何功伟两个人。农委成立后,李华召开了一个会议,我和何功伟都参加了。不久省工委就派我去荆州解决1935年10月二方面军长征后,未能随军出发的党员自动组织起来,在洪湖地区建立了一个“自发党”的事情。当这个“自发党”知道在武汉已经重新建立起湖北省委时,其中一个负责人就到武汉找到省委,要求承认他们、领导他们。省委就派我前去荆州。

在我“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向省委汇报时,李华和何功伟都没有在场,因此我就没有再见到何功伟。而在这之后不久,我就去长江局工作,两人各奔东西,一直没有见面。回想起来我和何功伟同事一场,只因李华召开会议见过一次面——我与他相识的一面,也是与他诀别的一面。

可是对这个只见过一面的人,我的印象很深。

后来我听说他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还知道原先和他结为夫妻的许云,后来成为郭述申的妻子。1938年我在武汉时认识许云,那时她不叫许云,叫许宝珍。全国解放后,郭述申和她住在北京红霞公寓,前些年我去过他们家多次,可是一次也没有谈到何功伟。直到这次我和李可一起旅行才意外地了解他的感人的事迹。

我们去的赤壁市是湖北咸宁地区属下的一

个县级市。何功伟是咸宁人,我们在赤壁的时候,咸宁市的樊副市长还到赤壁市同我见过一面。在一次用餐时我想到李锐有一个建议:希望在咸宁市有一所中学命名为功伟中学。我对赤壁的同志说,现在李锐没有在这里,我代他提出这个建议,我也希望你们代我向咸宁市委和市政府反映这个建议,并希望咸宁市把考虑的结果告诉我们。

最近李可又送来从“三何堂”、“何氏宗谱”中复印的“功伟烈士长卷”,包括“题词”、“生平”、“遗作”三个部分。原来我对何功伟的生平不那么了解,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就清楚了。特别看了他写给父亲的两封遗书,我和李锐有同感。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前夕,读到我的同龄人、同事何功伟的生平和遗作真是感慨万千。

下面我想从何氏宗谱何功伟烈士专卷中的第二、第三部分中抄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二)何功伟光辉的一生

何功伟,字超寰,又名何伟、何斌、何彬,笔名丰烈。1915年出生,6岁入私塾读书。1926年至1927年先后就读于咸宁县高等小学、武昌阅马场第四小学,1930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九一八”事变发生,为抗议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他组织同学参加抗敌后援会。1933年以全省会考第一名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参加读书会,研读马列著作。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他首先发起并联络武汉三镇50多所学校学生,成立武汉中等学校北上抗日救国联合会,任常务干事。

是年12月20日,武昌各校二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他任总纠察。游行示威时,“学联”主席、国民党复兴社骨干临阵脱逃,众多学生气馁散去,他挺身而出高呼“不要三分钟热度”、“不要一盘散沙”等口号,遂使散去学生重聚,顶风冒寒卧断武昌长街,通宵达旦,商民为之感动。因国民党当局下令封江,阻止武汉三镇学生汇集汉口,他于次日率学生代表去省府找秘书长

芦铸和教育厅长程其保谈判,迫使当局同意启航,他们渡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1936年6月“两广事件”发生,他在省立高级中学发起组织“反内战救国会”,并在武昌司门口和汉阳钟家村等处发表演说,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因受当局通缉而离汉去沪。不久,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工作,任常委。“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长。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他奉命率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一百余人到武汉,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被选为中共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次年2月调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着手恢复、组建各级党组织,举办工人夜校,组织罢工斗争,向延安输送一批优秀分子,壮大革命力量。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被选为省委委员。7月,奉派回咸宁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家乡中田小学组建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和中共鄂南特委书记。10月,日军侵占湖北广大地区,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按照省委预先指示,派人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边区特委接上关系,改鄂南特委为通山中心县委,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湘鄂赣边区特委委员。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何功伟在何功国的协助下动员其族叔——咸宁地方名绅何寰楨出面组成拥有三百余人枪的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建立挂榜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鄂南敌后武装抗日第一枪。不久,国民党顽固分子、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制造磨擦事件,杀害大队长何寰楨,唆使部分中、小队人员交枪叛变。在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基本解体的情况下,他愈挫愈坚,奔赴鄂南各县,重建和扩大抗日游击队伍,在武昌、鄂城交界的梁子湖地区分别组成“樊湖大队”“梁湖第二大队”,计1200人枪。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领导通山中心县委的中共湘鄂赣特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惨遭杀害,各地亦掀起反共热浪。为了保存革命骨干,他将一批共产党员分别向大别山地区转移,自己长途跋涉奔赴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并写出《鄂南工作情况

报告》。9月,受南方局派遣到宜昌,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次年1月与区党委宣传干事许云结婚。2月,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主持拟订革命气节教育提纲,纠正革命队伍中的“左”、右两种倾向,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6月,日军攻陷宜昌,湘鄂西区党委迁移恩施后改称中共鄂西特委,何任特委书记。因湖北大部地区沦陷,他实际担负的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他离开恩施,调任湘、鄂、黔、川特委书记。他身处险境临危不惧,想方设法安排各县的中共领导骨干撤退隐蔽,并亲自照料正在生产住院的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故迟迟未能赴任。由于特委秘书郑建安叛变告密,何功伟于1月20日被捕入狱,刘惠馨也于同日被捕。在狱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苗培成,第六战区参谋长兼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和湖北省三青团书记长等轮番劝降,诱以要职,均不为所动,并在谷仓(地牢)前与之公开辩论,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团结抗日和残害抗日青年的阴谋活动。他还在狱中创作《汨罗怨》、《狱中歌声》、《奴隶恋歌》等歌词并吟咏高唱,用以激励战友坚持斗争。

何功伟从狱中函告父亲:“……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枪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决不可动,此志决不可摇。”信被狱方截获后,转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阅后,惊叹“人才!人才!人才难得!”陈拟“以情动之”,令驻藕池之国民党军队派枪兵两人,将其父亲“护送”恩施,劝子“转向”。其父亲被迫反复探监十余次,他志如磐石,坚定不移。并以“……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手书与父亲诀别,劝父还乡。陈诚无奈,在信中批言“真伟大也!”下令将其杀害。

他在狱中备受折磨,先后被单独囚禁于地牢、荅窖和谷仓。在谷仓中曾绝食三天,要求“开窗透光,读书学习,每天倒一次马桶”。狱

方被迫接受了这些要求。此后,虽经频繁审讯乃至面对火红铁链而泰然自若,坚贞不屈。1941年11月17日清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令特务将他押至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上秘密杀害。临刑时特务喝令跪下,他微笑道:“共产党人是不跪下的。”在阵阵排枪声中,何功伟猝然倒地,时年26岁。

(三)几封极其感人的在狱中写的遗书

(1)1941年2月9日给父亲

儿不孝,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复不克分持家计。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河山还我之日即天伦叙乐之时。近来国际形势好转,敌人力量分散,使再益之以四万万人之团结奋斗,最后胜利当在不远。不幸党派磨擦,愈演愈烈,敌人汉奸复而构煽之,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此敌人汉奸之所喜,而仁人志士之所忧。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儿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儿死后实难瞑目耳!

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枪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谚云:“知子莫如父。”大人爱儿最切,知儿亦最深,曩年两广事变发生之日,正敌人增兵华北之时,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亡餐,为当局所不谅。大人常戒儿明哲保身,儿激于义愤,以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始终未遵严命。大人失望之余,曾向诸亲友叹曰:“此儿大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

于一人肩上者！”往事如此，记忆犹新，夫昔年既未因严命而中止救国工作，今日又岂能背弃真理，出卖人格而苟全身家性命？儿丹心耿耿，大人必烛照无遗。若大人果应召来施，天寒路远，此时千里跋涉，怀满腔忧虑而来，他日携儿尸骸，抱无穷悲痛以去。徒劳往返，于事奚益？大人年逾半百，又何以堪此？是徒令儿心碎，而益增儿不孝之罪而已。

儿七岁失恃，大人抚之养之，教之育之，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恩山德海，未报万一。今后亲老弟弱，侍养无人，不孝之罪，实无可逃。然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致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苦衷所在，良非得已。惟愿大人移所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几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且也民族危机，固极严重，然在强敌深入国土之今日，除少数汉奸败类，自外于抗战营垒；在抗战建国纲领之政治基础上，我精诚团结之民族阵线，必能战胜一切挑拨离间之阴谋。胜利之路，纵极曲折，但终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无疑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欣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景。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大可破涕为笑也。

不孝儿功伟狱中跪禀

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九日

(2) 1941年4月19日给父亲(二)

儿元月二十系狱，于今恰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俯仰无愧，故能饮苦酒以自甘，宁杀身而不悔。狱中诵《正气歌》，咏《满江红》，曾不觉窗外韶光飞逝，莺舞春木矣。而本月八日大人来施探狱之后，始痛觉不孝之罪深重，实内疚于神明，意夺心折，度日如年。夜间梦魂不安，每发为痛楚之呻吟。看守者闻之，尝将儿唤醒。午夜梦回，百感交集。设忧愁果能伤人，儿恐不待斧钺加身而后死也。十四日晨，大人送来肉食，食之不能下咽，下午始勉强食之，而又不能消化，遂致腹泻。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

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报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况大人爱儿远胜诸弟妹。儿幼年失恃，倍觉父爱之慈祥者乎？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人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案决之后，愿大人携被褥以俱来，与儿同居数日，少伸骨肉之情，此番生离，或即死别。设竟于此时坐失一面之缘，儿将更不胜其终天之恨矣！

儿功伟跪禀

三十年四月九日

(前禀被主席取去，未蒙大人俯阅，谨再另纸录呈)

注：“主席”指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

(3) 1941年6月给许云

在临刑前我不能最后的和你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此次的被捕，由于我自己的不慎。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一九四一年六月

(4)《写信时间缺》给许云

……生儿育女是人生的内容的一部分，鉴于你这次难产，我自责对孩子的出生没有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一切辛劳由你先承担着吧！

虽然我的身体不太健康，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

天冷衣单，代小刘募集的棉衣请快设法寄来，因为她生产特别需要。此地气候恶劣（指政治气候——许云注），重庆山地亦恐相差不远，愿珍重……

(5)《题这几个字的时间不明》给妹何惠文

吃自己饭，流自己汗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宗，
算不了好汉。

(责任编辑 方实)

中共台湾地下党张志忠烈士

● 吴克泰

1946年3月初，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就学时，找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由学委钱李仁同志谈话后即交了入党自传。

中旬，难得有一条大船开台湾，上海地下党即派我回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说很快会有同志去同你联系。回到台北后，我左等右等也没有人来，非常焦急。此时，上海地下党同志来信说，再耐心地等一下，肯定会有人很快来找你。

4月初，我在台大复学，开始在学生界、新闻界结交新老朋友，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4月下旬一个晚上，等待已久的党内老干部张志忠同志终于来到我家，庄严地向我宣布：党已批准你入党了，本来应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规定候补期，但台湾地下党刚在创建，这些手续都免了。他又说，因为去中南部跑了一圈，所以来晚了。他也回了一趟老家，家人看他回来，都喜出望外。从此，他每次回到台北，就来我家住，同我单线联系。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干、朴实、诚恳，没有架子。他一住下，洗了澡，就要动手自己洗衣服，被我制止了。我说，在台湾客人一般不自己洗衣服，按咱家乡习惯，以后就交给我家人洗好了。到别人家里也一样。

这一天晚上，他首先向我交代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向我分析了国内形势，台湾岛内形势。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说旧台共留下来的人全部“转向”了，只有翁泽生一人坚持到底，可惜他早已病故了。他强调，对于被捕过的人的入党审查要特别严格。他在台湾南北跑了一趟又一趟，接关系，发展党员，至6月初建立了各地组织机构，告我台湾地下党组织已正式成立，并去上海向上海局汇报。

有一次谈到学运，他说组织游行示威时，

最重要的是要组织纠察队，从游行队伍两旁保护队伍不受冲击。张志忠同志教给我的这一条宝贵经验，我在次年1月9日组织领导台北万名学生反美抗暴（即抗议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大游行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游行队伍不仅没有受到冲击，也没有人被打或被捕，取得了完全成功。第二天上午，张志忠就到我家，给了我许多表扬和鼓励，传达了地下党对我的关心与爱护，并给了我几项新任务，包括掩护来自延安党中央机要局的长征干部程浩夫妇和陪他们来的上海台湾同乡会干事、地下交通员林崑同志以及负责建立学委会等。

“二·二八”起义时，张志忠同志正好在嘉义。后来，我进台南大山里，参加据点的工作，遇到同张很熟的嘉义中年人庄泗川（地下党员）。他说，“二·二八”时，张志忠同志就地组织了“民主联军”，指挥了进攻飞机场的战斗，险些丧命。后来在嘉义乡下坐卡车转移时，遇上国民党军又一次遇险，他立即跳下卡车，从田埂上逃脱。

“二·二八”后，我被通缉，便随林崑一度走避上海，改名换姓，在李伟光同志领导下，接任同乡会总干事的工作。

夏末，奉调秘密返台，先回台北后到台中县工委协助王天强、林青山等同志开展“三七五”减租的斗争。在这里我方知道王天强同张志忠是集美中学的同学。约一个月后的黄昏时刻，张志忠同志急如星火地跑来通知：浊水溪南某地出了事，有可能牵连到王天强这里来，叫我马上离开那里趁夜去县工委机关。张志忠同志不辞辛劳，保护党、保护同志安全的高度负责精神，令我十分感动，至今难忘。

同年末，根据同乡人、党外同情者的建议，

张志忠开始考虑开辟兰阳地区的工作，我陪他到家乡罗东、苏澳等地考察，此行成了兰阳地区发展党的工作的滥觞。他走路时，身子往前倾斜一点，走得很快，我虽比他年轻十多岁（这年我二十二岁），却怎么也跟不上他。这使我确信，他是在抗战烽火的战场上锻炼出的一双铁脚板。

1949年3月，根据上海局通知，台湾地下党派我率领台湾省青年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本来预定很快就要随同解放军打回老家去，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拖延下来。听说地下党受到毁灭性破坏，省工委的其他领导都叛变投降，只有张志忠一人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文革”后，家乡的消息陆陆续续地传来。据我所知，所有健在的台湾地下党成员都肯定张志忠同志始终没有投降，是壮烈牺牲的。他们都说，张志忠同志是台湾地下党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前些年还演了一出戏来歌颂张志忠同志。

我于1987年2、3月间赴美国各地参加“二·二八”四十周年纪念会。到洛杉矶时，一位张志忠同志的同案人杨克村老先生（地下党外围同情者），专程从台湾赶来在老台共简娥家等着我。他说，张志忠及其夫人季运发生危险后即搬到李振芳家受他掩护。但国民党特务终于发现了张志忠夫妇的住处，对张志忠守候跟踪了一个多月，到1949年12月29日才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园外边的马路上，开着吉普车撞倒了骑在自行车上的张志忠，即予逮捕。张志忠被捕后特务审问他，要他招供。但张志忠坚贞不屈，连声说“你打死我好了”。连特务、狱吏都拿他没办法。杨克村老先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李振芳（最后掩护了张志忠夫妇的党外同情者，也是同案人）临终前特地嘱咐他：张志忠和夫人季运是坚持到底，坚决不投降的。他们没有出卖任何同志，是英勇牺牲的，此事一定要向北京报告。李振芳夫人卢碧霞（没有被捕）临终前也叫杨克村去作了同样的嘱咐，并强调张志忠夫妇没有咬任何一个人。我回京后即写了材料经有关同志向中组部报

张志忠烈士



告此事。

后来，我在北京遇到了叫苏东兰的小同乡，他说曾同张志忠在台北市南昌街的保密局监狱里坐过牢。他说，张志忠看见有人关进来就大声叫喊：“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张志忠同志的这三句话在台湾左派中流传至今）他经常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来鼓舞大家。狱吏对他又怕又尊敬，说他是共产党里真正的硬骨头，好样的。有一次，蒋经国亲自到监狱里来向张志忠劝降，很有礼貌地问：“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很干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不久以后，蒋经国第二次来劝降，问的同样是：“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再次坚决表示：“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旋即于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同志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啊，这是多么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台湾地下党的光荣和骄傲，他夫妇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长期的调查核实，于1998年1月将张志忠同志和夫人季运同志定为烈士，并通知了他们的遗属。张志忠夫妇在天之灵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中共创建时期的蔡元培

● 陆米强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8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在怀念革命导师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同时,也不能忘记那些为中共的创立直接、间接作出贡献的人们。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就是其中的一个。

蔡元培于1868年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1940年病逝。蔡元培出身科举,为清光绪年间进士,以后又留学欧洲,成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就毅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7年至1923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中国历史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纵观五四运动前后和中共建党前夕的这段历史,蔡元培始终以一位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且他的一生也从未转向马克思主义。然而,在此期间,他却凭借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客观上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

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选用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出一大批勇于变革创新、敢想敢做、敢于革命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提供了北大这个基础雄厚的民主革命基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蔡元培的一份功劳。

整顿和改革教育,唯才是举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被称为老爷。他们读

书志不在求学,而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是一个变相的官僚衙门,时人称之为“官僚养成所”。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后,由严复任校长。校名改了,校长换了,但校风改变却不大。昔日的腐败和官僚习气依旧延续下来,封建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1917年1月,蔡元培任校长后,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方针,大刀阔斧地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蔡元培首先面向学生,着重改变他们科举时代的那种封建腐朽的旧观念。他强调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依他们的学问有无和好坏而定,而不是看他们的地位高低、家庭贫富和来头大小。他还认为,办学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教师队伍。因此,他在用人方面,坚持唯才是举的标准,延聘学术水平高、具有真才实学的名家。在道德方面,要求教员为人师表。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下,北大在引进人才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北大许多青年学生在这批德才兼备、学识渊博、具有高度开拓精神的新派人物的教育培养下,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解放,他们高擎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勇于变革创新,敢想敢做,敢于革命,在北大首先发起五四爱国运动,并推动全国各地民众,形成一股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

五四运动为中共的创立 提供了社会条件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5月1日那天,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后,徐世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

定拒绝签约。但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发出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国务院电报处一人当晚将此消息偷偷地告诉时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林长民。次日凌晨,林长民告之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汪十分着急,此时有人建议,把消息通知北大校长蔡元培。由于汪大燮与蔡元培平时关系密切,于是就马上去蔡元培家里去共商对策。蔡元培听到后感到非常绝望和震惊,他不得不将挽救国家命运的一线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于是就立即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拒绝签约的办法。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获悉此消息后,群情激奋,校园内一片沸腾。千余名学生及校外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共商行动方案。大会一致议定:由各校代表回校通知,于明日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5月4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掀起。

在五四运动中,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精神,正是后来中国革命的基本特征。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形成的这股新的革命潮流,在客观上要求它的领导者组成坚强的战斗司令部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提倡学术思想自由, 支持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大教员中,包括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学派的人,既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物,又有思想保守但不乏学术造诣的学者,学校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盛态势。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自由的卓见,是非常可敬可贵的,因为它冲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开辟了一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崭新道路,为广泛传播民主爱国革命思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为了鼓励学术研究,蔡元培早在1917年就在北大提倡社团活动。至1919年初,在蔡元



蔡元培先生

培的领导下,北大成立的学术团体有新闻、化学、哲学等研究会;成立的社团有进德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他还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北大讲学等。这些学术团体的研究活动,打破了从前校内沉闷颓废的局面,激发起师生对学习新思潮的热情,使大家的思想更加活跃和开放,全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蔡元培组织社团活动的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发起了社团的组织活动,当时的进步社团多达三四百个,如长沙的新民学会、北京的少年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济南的励新学会等,这些社团大多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在中国的进步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此期间,蔡元培还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从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等方面逐渐转变为宣传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北大成为全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在北大开设社会主义课程。蔡元培不但同意李大钊的这些

做法,而且还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两间房屋供其使用。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又在北大秘密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而蔡元培则向北大进步学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

五四前后,北大在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讨论社会主义方面,已经不是分散的行动,而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在军阀政府严密防范的社会条件下,北大居然能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这与蔡元培的民主思想作风和支持保护态度是分不开的。

支持帮助中共的早期创始人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与蔡元培的支持帮助有关,因为他们都是从北京大学这个舞台,走向全国的。

蔡元培很早就有以教育为手段,来唤醒民众的想法。1917年初,蔡元培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孙中山当时也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辛亥革命后,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割据的黑暗年代,蔡元培对当时的现实非常不满,主张教育救国,从教育着手,启发民智,培养国民高尚的人格,把北大改造成为一个充满民主爱国气氛的重要思想阵地。

为此,蔡元培设法招聘具有真才实学的进步学者和专家前来北大任教。当时汤尔和、沈尹默给他介绍了陈独秀。陈独秀昔日在办《安徽俗话报》时,就给蔡元培留下“一种不忘的印象”,他很佩服陈独秀办报的“毅力和责任心”。后来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也使他激动不已,于是决定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但陈独秀却以去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蔡元培求贤若渴,几乎天天去拜访陈独秀,并表示全力支持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转移

到北大校园来办,最后弄得陈独秀很过意不去,只得接受蔡元培的诚意邀请,在蔡元培的全力支助下,《新青年》杂志的宣传阵地在北大日益壮大,最后形成新文化运动向全国迅猛扩张的火热场面,陈独秀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以至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头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18年1月,章士钊又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到北大接替他担任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蔡元培欣然同意。从此,李大钊就利用北大图书馆这个有利条件,为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的名声也越来越响。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也是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到党成立前夕,他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毛泽东也是在蔡元培的安排下,才能够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1918年8月,毛泽东由湖南到达北京,打算赴法国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定留下,在北大找一份工作。当时随同毛泽东一起到达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肖瑜(子升)等人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看了这封信后,感到毛泽东能刻苦自励,非常高兴。因此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大钊,请李大钊在北京图书馆内为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对蔡元培非常敬重,“他给蔡元培的每一封信中都称‘夫子大人’,他自认为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蔡先生的无限崇敬。”

以后,毛泽东在北大与李大钊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广泛接触,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后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都是与蔡元培对他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

在此期间,许多进步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干部,也都与蔡元培的支持帮助有关。

1912年曾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大力倡导和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5年6月,蔡元

培、李石曾等人又组织了“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一些贫穷而又热心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渴望了解法兰西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他们更希望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但因那时俄国正在进行战争，所以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法国学习。一些著名的学校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团”，通过由蔡元培等人主持的“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手续。1919年10月至12月间，赴法学生达300多人，其中包括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等。从五四运动到1920年，勤工俭学到达法国的总人数达到1600多人。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法国通过同法国工人阶级的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尔后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陈延年、陈毅、聂荣臻、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虽然不是蔡元培始料所及的，但正如吴玉章所说，“这也应当归功于子民（即蔡元培的自号——笔者注）先生倡导勤工俭学之力”。

正是由于蔡元培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因此，当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不幸病逝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电文对蔡元培的一生高度评价道：“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责任编辑 程 度）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百年聚焦（上中下）	史义军	59.80	6.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化 苏采青	59.80	5.00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16.00	3.00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资费减半）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黄昌勇	14.60	3.00
之二 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晓风 梅志	18.80	3.00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叶永烈	15.00	3.00
之四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	16.60	3.00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 泳	14.80	3.00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谢泳	16.60	3.00
知情者说第二辑（共八册）（邮购全套八册邮资费减半）			
之一	肖恩科	15.70	3.00
之二	张树德	13.90	3.00
之三	魏敬民 徐 林	15.10	3.00
之四	程 瑾 朱 仁	14.50	3.00
之五	万 须 木 心	13.90	3.00
之六	山 椿	15.10	3.00
之七	庄 园 郑宏颖	14.50	3.00
之八	范广群 霍 岩	13.90	3.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本书将告诉您：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请求的原因；邓小平坦言他也犯过错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的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赵树理与陈伯达相近的感受。

《史无前例的年代》作者是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文革”中目击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采访了包括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华国锋在内的许多当事人，并参加了审判“两案”的采访。他撰写的这个纪实作品，从1965年起围绕历史事件依次展开，记录了大量真实情节，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回首文革》上下两册各自汇集了三十六七篇文章，上册侧重总体分析，下册偏于事件介绍。作者阵容整齐，皆为高层当事人和权威级研究者。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参与筹备中共“一大” 的邵力子

● 祥 钧

八十年前在上海召开的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虽然没有正式列入代表名单，却为会议的召开出谋划策忙前忙后不亦乐乎，他就是浙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

谁都知道他身居国民党要职，是后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那时却参加了筹建中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高举《觉悟》大旗为社会主义呼号

五四时代，新思想是从报刊开始席卷全国的。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月刊。

在上海，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影响极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过，“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毛泽东讲的《民国日报》，指的是她的副刊《觉悟》。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主编是国民党右派理论家叶楚伦，邵力子是总经理、《觉悟》副刊主编。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副刊的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民国日报》每天三大张，副刊为两个半版。1919年6月16日，《觉悟》副刊首次在《民国日报》第八版出现。以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特色，为了便于保存和查阅，每月还发

行《觉悟汇刊》一册。

利用《觉悟》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是邵力子的一大发明。《民国日报》的社论一般是叶楚伦操刀，《觉悟》则由邵力子负责，叶楚伦给《觉悟》的稿子，邵力子常常扔进字纸篓，而《觉悟》常发表与《民国日报》社论唱反调的社论，造成了《民国日报》正版大家不看，争看副刊的现象。

邵力子吸纳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自己办报的养料。这个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和鼓舞，特别是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拟定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清晰明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邵力子读后如梦初醒，十分佩服，对李大钊的文章每篇必读。他还向陈望道借来许多日文版的马列著作，用和文汉读的办法，读呀读，感觉十分亲切，成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邵力子主持的《觉悟》副刊发表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政论性文章达950篇左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他自己撰写的主要作品有：《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有真像》、《共产与公道》、《拒受遗产和共产主义》、《主义与时代》、《心与力》、《马克思底思想》、《救中国的对症良药》、《社会主义与公妻》、《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

《觉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主要特色就是以显著的位置和优先的篇幅刊登当时一批共产党人的文章，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邵力子、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肖楚女、向警予、包

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杨贤江、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共计 200 多篇。

在《觉悟》上除了共产党人发表文章，一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发表文章，使《觉悟》影响力极大。如鲁迅，在 1921 年 5 月至 1923 年 8 月间，就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论、小说、翻译作品 14 篇，其中有《读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等，《不周山》在《觉悟》连载了 40 多天。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呐喊》“自序”也是在《觉悟》首发的。不仅如此，邵力子还以“本刊记者”的名义，自己撰文，在“文坛消息”栏内介绍鲁迅的创作动态，把鲁迅的小说集出版誉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陶堰村人，20 岁考中举人，但他放弃了考进士，到上海学西学，之后，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结识，1912 年由同盟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报道这一消息，当时他还是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在讲课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 年 2 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后，邵力子感到振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苏俄是平等对待中国的真正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以极为友好的态度热情地介绍苏俄的情况，对中俄两国的友谊高度评价，对苏俄政府平等的对华政策进行积极反应，成为人们熟知的“亲苏派”。

邵力子在五四前后的表现，颇为出色，是一位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勇猛斗士。1919 年 5 月 5 日他在报馆值班，得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立即采取行动，当天夜里通宵工作，亲自编排好有关五四运动的版面，在报上大篇幅醒目地予以报道。第二天，他带着报纸到复旦大学，紧急集合全校同学，亲自宣读《民国日报》上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头条新闻。邵力子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京的学生已行动起来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没有吗？赶快行动起来吧！”邵力子的鼓动，燃起了学生的激情，复旦大学学生立即罢课，联合其他高校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纷纷走



邵力子

上街头，游行示威，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到工、商界去，酝酿罢工、罢市，从而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五四热流的推动下，邵力子感到在中国实现苏俄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可能，对此进行广泛的宣传迫在眉睫。1919 年 6 月，他在《民国日报》上开出《觉悟》副刊，并担任主编，立意要将《觉悟》办成促进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觉悟》宣传马列主义，颇有特色，做到四个结合：把译载马列主义的原著和运用马列基本观点撰写专论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介绍苏俄各种制度联系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批判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在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邵力子与共产主义理想更贴近了，1920 年，他在上海参与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与他受“五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自己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1920 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同时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分工是南方由陈独秀负

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来由。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就入住于上海法租界打浦桥三益里5号邵力子的家中。

1920年5月,邵力子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从苏联来华援助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夫妇。在这之后不久,由陈独秀和邵力子为主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专门请孙中山为之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字,参与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还有: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戴季陶、杨明斋等。陈独秀负责,为书记,活动分别在环龙路渔阳里的陈独秀家和邵力子家。研究会成立后,研究会迅速地与第三国际建立了联系渠道,重要的事情都找他们商量。研究会不是纯书本式的,除了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女子学校,吸收一些有觉悟的女子来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想的启蒙。研究会还帮助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重要成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陈独秀对组建共产党十分急迫,1920年他对张国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他告诉张国焘,已经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

约在1920年8月底,趁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上海共产党小组宣告成立,成员就是陈独秀说的8人,开成立会到会的是这8个人,但7人明确表示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戴季陶在成立会上明确表示不参加。他与邵力子情况相同,也是国民党党员,上海共产党成立,他参与了许多准备工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但他表示他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深切,不能够成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他的理由是,孙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加入别的政党。

上海共产党成立得磕磕碰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戴季陶明确不能参加外,大家当时对成立组织意见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是赞成成立严密的组织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喜

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经常过组织生活;还有沈定一,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组织生活。邵力子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元老,现在又任着国民党的职,但他又信仰共产主义。为此,成立会上专门研究了她的情况,决定邵力子对外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党员,他可以不经参加小组活动。

可见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有特殊意义,他是仅有的两位国民党党员参加中共创建筹组活动的人(还有一位是沈玄庐,他很快就退党了),他成了特殊的中共党员。邵力子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是:“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到报馆里工作,各学校还时常找我演讲;另一方面,我当时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了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工作。这些职务,都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活动比较合适。加上那时英、法租界的巡捕房经常与我捣乱,使我不便经常参加小组生活。”邵力子这种“半隐身”的共产党员,有利于他开展活动,为党工作,他帮助了不少从内地来上海追求革命的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他还举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协助一部分机器工人发起组织机器工会。

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对全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开拓作用。《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主要撰稿人为陈独秀、邵力子、李达、陈望道和李汉俊。同时,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更自觉地宣传马列主义。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积极指导和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不久,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为“一大”召开操劳

到1921年7月,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条件已经具备,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为中共“一大”的召开,经常通宵达旦地在邵力子家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邵力子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与了“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开幕,这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部参谋

长,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到7月30日,中共一大正在举行第六次会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会议,原定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开始不久,有陌生人闯入,接着法租界巡捕房就来侵扰,知道已经被反动当局给“盯”上了,会议代表迅速疏散,但会议还没有开完,怎么办?这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和邵力子等建议转到嘉兴去开比较好。邵力子说,上海到嘉兴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我有一绍兴同乡好朋友陈仪,是浙军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在杭州嘉兴一带,安全上出不了问题。

当一大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时,邵力子因《民国日报》的编务工作走不开,但他在《民国日报》7月31日的《觉悟》副刊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笔名“光亮”的《再论太补论主义的选择》一文,批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义正辞严地公开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资专政’。”这表明邵力子颇有心计,特意在此时发表该文,对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公开的理论献礼。

这时,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画舫游船上胜利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并通过了事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身跨两党,主张国共一家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多,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则是数得过来的一两个。邵力子作为先参加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他对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与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张太雷一起过组织生活。1922年,他出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入学。1922年至1923年间,他积极参加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的工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叶楚伦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5月,邵力子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护军使秘密下令缉拿“布尔什维克分子栗子(指邵力子)”,邵力子不得不

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邵力子与周恩来心有灵犀一点通。当年邵力子在上海创办和主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周恩来在天津创办和主编《觉悟》月刊,不谋而合,共同宣传马列主义。

周恩来根据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制订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经常为军校学员讲课和演说,宣传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详细地解释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原因,指出了工农大众如何解除痛苦的办法。周恩来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建设一支人民的革命军队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邵力子与周恩来同心相映,在讲课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思想。他说,“新三民主义则代表了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已经由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主义思想,演变为具有民族、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新内容。”对周恩来建立人民军队的主张积极响应。

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批准,邵力子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分,在黄埔军校共产党小组公开过组织生活。邵力子对周恩来的才能非常折服,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的右派作坚决的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员在军校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学校的活动中,他更多的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他在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辅佐周恩来,支持进步军人。

邵力子在黄埔军校非常注意有目的地引进倾向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以改造国民党。有一次他拉着已是青年团员文强的手说:“国共是一家,CY(青年团)是CP(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国民党太老大了,需要引进新党员,像CY这样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记总理说的‘以俄为师’,难道师友、师生还不是一家吗?我不相信死顽固能够反对得了。”对此,蒋介石大为不满。

决定邵力子退出中共

蒋介石知道邵力子原来是双重党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却身居国民党要

职,尽管表面上是国共合作的好事,但毕竟心中十分不快,想办法要邵力子脱离中共,只保持国民党党员一种身份。蒋介石采用的是“拉”的手法,立即任命邵力子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但对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放心不下,由于是国共合作的大气候,不能明确要求邵力子脱去中共身份,要想办法让他不得不脱离中共。

机会来了,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一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派邵力子出席,中共派谭平山出席,这下,自然而然,邵力子就不能是中共的身份了。这也是蒋介石明确地向中共组织也向邵力子本人要求单一国民党身份的举动。为此,中共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到邵力子本来就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中共的,留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退出中共,保留国民党党员的单一身份,这也是为了党的利益,便于在国际会议上活动。邵力子在与中共代表谭平山赴苏联出席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专门举行了欢送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瞿秋白在致欢送词时,还专门就邵力子脱离中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欢送邵力子赴莫斯科开会,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决定邵力子退出共产党,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的需要。”邵力子在会上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在国民党人中,邵力子算与苏联的关系较密切的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邵力子在他主编的《民国日报》头版套红标题,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之后,在《觉悟》上刊发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及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1921年邵力子受第三国际的委托,协助苏俄塔斯社在上海北礼查饭店(现在的上海大厦)建立上海分社。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立即在《民国日报》上刊出悼念列宁的文章,同时电贺斯大林担任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塔斯社上海分社曾转达过斯大林对邵力子的问候。蒋介石派出邵力子,目的除了逼邵力子退出共产党外,还有更深的用意。他与邵力子是同乡,又同是国民党人,他希望邵力子发挥与苏联的作用,向斯大林陈述他的话,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而不必通过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的一天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专门

会见了邵力子,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表示苏联将给予一定的支援,预祝革命一定会在工农团结下胜利。斯大林还说,他看过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也读过邵力子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邵力子没有把蒋介石的话直接对斯大林说,因为邵力子毕竟曾经是中共党员,知道中共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中国国民党的领导。

邵力子在会议期间与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同心同德,紧密配合,尽力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完满地实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意愿。

退出中共,对于邵力子本人来说,苦于无分身之法,也只能如此了。但从共产党方面来讲,他是服从组织决定。原因有四:第一,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人只代表一个党。国民党决定派邵力子参加,当时中共党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旨意以及与国民党的关系,为了便于国共两党在会议期间各代表其党派活动,认为邵力子以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身份比较合适。二是便于邵力子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有利于国共合作,特别是转变蒋介石的思想。当时国民党内分汪精卫之左派,蒋介石之中间派,戴季陶之右派,邵力子退党,有利于在国共合作中加强国共关系。三是陈独秀等人对邵力子放心不下,认为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做的是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与国民党的关系非同寻常,在中共党内是特殊党员,党内有许多事告诉他不放心,瞒着他又不好,所以还是趁此机会让他退出共产党比较好。四是陈独秀比较暴躁,作风比较专横,拍桌子摔茶碗,与邵力子的性格反差太大,两人性格合不来,相处不融洽,陈独秀早就想“清除”邵力子,邵力子早在1922年因吃不消陈独秀的独断专行与沈玄庐一起提出退党,结果毛泽东出来调解,邵力子留下来了,而沈玄庐则退出了。这之后,邵力子还是常被陈独秀气得七窍生烟,这次正好顺水推舟。

1949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在成行之前就作好了不南返的准备。结果,他留在了北平,并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责任编辑 舒元璋)

作者更正

本刊2001年第6期《在白色恐怖下为李大钊送葬》一文,出殡安葬的时间应为4月28日。

彭泽民： 孙中山信徒 共产党挚友

● 章定龙 彭润平

国民党左派元老、爱国华侨彭泽民是广东四会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他毕生追随孙中山，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坚持民主爱国立场，为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奋斗一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也是深受广大华侨爱戴的华侨领袖。

他跑到孙中山遗像前痛哭一场

1902年，23岁的彭泽民为生活所迫，漂泊海外，侨居马来西亚。1906年7月，孙中山到吉隆坡，在华侨中宣传革命，组织同盟会。彭泽民受其影响，追随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同盟会吉隆坡分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该分会的书记。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1月彭泽民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

1922年8月，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邀请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然而，此举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回国，专程到广州去谒见孙中山，一连几次都被国民党右派所阻挠。

孙中山得知后，特发给他一个特别通行

证，并与他约定了具体时间。在数月之内，他与孙中山交谈了国内政治、军事及南洋党务等多方面的问题。孙先生则向他详细介绍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彭泽民听后，心里豁然开朗。

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中，彭泽民认识到，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有着质的区别。在民族主义方面，过去只提反满，现在提出了反帝；在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具体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彭泽民在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悼念孙中山的大会上，追述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矢志不渝。9月，他被选为国民党马来西亚芙蓉总支部书记。第二年，在广州国民党二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海外部部长。

彭泽民回国后，目睹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幕幕丑恶行径，特别是1925年11月23日“西山会议派”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李大钊、毛泽东

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职务，大造反苏反共、反对三大政策的舆论，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对于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十分担忧，认为这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他为此特地请教了毛泽东，毛泽东安慰他说：“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

毛泽东和他的谈话，以及后来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陈延年、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与他的接触，给了他极大安慰和鼓励。他感到与共产党人坦诚相见，思想融洽，政见一致。

5月17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彭泽民首先发言反对，声泪俱下地痛斥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也都起而响应，激烈反对。

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没有结果。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

翌日，国民党右派在报纸上公开辱骂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为“三怪”，说他们身为国民党，却与共产党站在一起。《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彭泽民曾在孙中山遗像前痛哭了一场。

援助国民革命军 出师北伐

1926年1月，彭泽民创建了华侨协会。

这个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建立的

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侨群众团体，在他的领导下，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5月15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递交了《请迅速出师北伐案》。提案指出：“海外华侨邀来函电，请迅速出师北伐，以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北洋军阀，建立统一全中国之强有力政府，俾彼等在帝国主义铁蹄下过生活者有所保证，彼等并愿竭力为后盾，其情辞至恳切。我革命军若犹迟疑不出，则海外华侨将由失望而灰心，由灰心而解体。再则，张、吴等军阀承受英国等帝国主义之旨意，正向国民军及湘军进攻，我革命军若坐视其亡，则国民革命危也，广东革命根据地危也。”

他大声疾呼，希望国民党中央作出决策，立即出师北伐。在他领导下，海外华侨敦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热潮此起彼伏，持续发展。

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

北伐誓师之后，彭泽民领导爱国华侨，竭力支持北伐战争。就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翌日，彭泽民倡议在广州召开了华侨援助北伐战争代表大会。

会议一致赞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和华侨协会关于“联合一致，为北伐后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把军阀杀个净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在广州建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在海外各地设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分会，统一领导和推动华侨支持和



彭泽民先生

援助北伐战争的爱国运动。会议通过了《华侨北伐后援会简章》，宗旨是“援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求中国之真正统一。”

根据大会决议，7月16日，彭泽民签发了《海外部通告华侨组织北伐后援会》文件，指示海外各总支部、支部立即行动，“创造民国之光荣、伟大事业，赞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期中国之真正统一、民族之自由平等”。据统计，在北伐战争期间，各国先后组织的华侨北伐后援会分会达500多个，会员约100万人。至1926年底。华侨捐助北伐的军饷，达100万大洋，另有装甲车、枪支弹药、医药用品等。

海外华侨的北伐宣传工作也积极配合，取得良好效果。欧美的华侨报纸、东南亚的华侨报纸许多都开设专栏，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报道北伐军进军的消息，论述北伐的意义。

在华侨北伐后援会的指导下，海外华侨组成了海外北伐工作团和华侨特别宣传队等团体，分赴北伐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不朽战功。

1926年10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合发起“华侨恳亲大会”，邀请海外著名侨领和华侨代表回国观光和视察。彭泽民任恳亲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1月12日，华侨恳亲大会隆重开幕，彭泽民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

借鉴毛泽东经验办华侨讲习所

为培养华侨运动骨干，1926年10月初，彭泽民借鉴毛泽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提出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得到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由他担任所长。

华讲所的办学主旨是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方法，培养海外党务指导人才，服务于华侨反帝爱国运动。

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彭泽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原则，他任命共产党员张航先为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

作，聘请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肖楚女、陈其瑗、许超循、甘乃光等担任华讲所兼职教员；聘请容保辉任华讲所军事训练员；陈碧海任事务员。这一批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华讲所任教，成为他办好华讲所的可靠保证。

1926年11月初，华讲所在广州华皋大道（现广州军区后勤礼堂附近）正式开学，招收学员80名。华讲所课程包括理论教育、党务教育、时事政治教育、业务教育等方面。

彭泽民还参照农讲所的经验，组织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把所学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华讲所在其规模、影响上虽然不如彭湃和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它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之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培养华侨干部的一次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讨蒋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于1927年3月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彭泽民继续当选为中央执委、海外部部长，同时又担任国民政府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等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要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都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白色恐怖顿时笼罩全国。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奉系军阀同蒋介石相呼应，一时间，反革命的腥风血雨横扫全国，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李大钊牺牲了，陈延年、赵世炎、肖楚女等牺牲了。国共合作毁于一旦。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彭泽民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4月18日在汉口举行的会议。会上他毅然与宋庆龄、吴玉章、陈友仁、谭平山、邓演达等一起,通过了关于蒋介石反革命罪状的中央训令及宣言,并作出了撤销蒋介石职务的决定。

4月22日,他与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等40名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一起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召集武汉各界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与会群众近40万人。彭泽民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孙总理三大政策,非打倒蒋介石不可!”5月13日,彭泽民又签署《海外部紧急通告》,号召海外各党部、各华侨团体一致声讨蒋介石,肃清一切反革命派。

同汪精卫的一场唇枪舌剑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汪精卫集团也蠢蠢欲动。6月10日,汪精卫赴郑州与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以后,冯玉祥又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如在弦上,已经到了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

彭泽民闻风,心急如焚,立即找汪精卫,问:“外传国共分家,可有无此事?”

汪强辩说:“不是我们要分人家,乃是人家要分我们的家!”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电文,递给彭泽民看。电文上写着“须即成立工农革命军”、“速成立军事裁判委员会”、“实行土地收归国有”等。

彭泽民阅毕说:“我看此电文没有分家的意思!”

汪精卫迫不及待,大声叫道:“你何糊涂至此!你是国民党人吗?你看这电文不是要消灭国民党吗?组织工农革命军不是完全要听共

产党支配吗?成立军事裁判委员会不是要我们自己杀自己同志吗?土地收归国有,不是要实行共产吗?”

彭泽民听了,并不以为然。他不紧不慢地说:“我认为不至如此严重。先生要明白,现在是两党合作,凡事尽可共同磋商,不可两相疑忌!否则,将何谈合作?”

汪精卫怒不可遏,骂道:“你是本党老同志,尚且如此!难怪许多人说你‘叛党投共’了。”

彭泽民义正词严地说:“我只是遵照孙先生的旨意在做国共合作之事,叛党的不是我,怕另有人在。”说完即起身告辞。

汪精卫叫住他:“你先别走……”

彭泽民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不等他说话又问:“听人讲宁汉两方将要合作,此话是否属实?”

汪精卫矢口否认:“此乃传言,并无此事。”

彭泽民说:“若有此举,则中央威信扫地!惩戒的墨迹未干,又与叛者合作,国民党的前途不堪问了!”

彭泽民说完,汪精卫暴跳如雷。

彭泽民毫不屈从,对汪说:“我与你20多年同志,向来言无不和。先生今此之见,我绝不赞同!若先生坚持如此,我以为切切不可,我是一个海外华侨,政治经验远不及先生。我自知力薄识浅,不够有为,不能协助!只有将一切职务告辞,重返南洋,不复留此有累先生了!”说罢昂首离去。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名义,秘密召开反共会议。凡兼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不得出席。

会上,汪精卫宣布与中共分裂,彭泽民起而反对。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总理遗留给我们的。总理新亡,你们便变更他的政策,我不同意。”

散会已是深夜12点。为了让共产党人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彭泽民即速把汪反共、背叛革命的情况密告了吴玉章、林伯渠。随后,又通知海外部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华侨,让

他们立即转移，并发给每人100块大洋做盘缠。

15日，汪精卫公开反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彭泽民也离开武汉，奔赴南昌。

南昌起义后随军出发

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后，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彭泽民感到非常痛心，当他南下南昌时，刘伯承在泸顺起义以后，也来到南昌，他们住在一起。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武装起义，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彭泽民积极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

上午9时，在原省政府西花厅，彭泽民出席了前委召开的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彭泽民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翌日，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明确宣布要继承北伐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时发布了对蒋介石、汪精卫的通缉令。

《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署名有宋庆龄、恽代英、吴玉章、毛泽东、彭泽民等22人。这一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反动集团的一系列叛变行为，指出：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党部与政府“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集团大为震惊。蒋介石、汪精卫立即调兵遣将，进行“讨伐”。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向广

州进发，准备到东江地区利用那里的群众革命基础，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

从南昌到东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另一条是小路，取道临川、会昌、寻邬进入嘉应州地区。当总指挥部决定走小路时，刘伯承担心彭泽民的身体，劝他乘车走大路，彭泽民说：“我的身体很好，与部队在一起，还能做点事。”

8月5日，鬓发斑斑的彭泽民随军出发了，他不骑马不坐车，随军南征，直至海丰。一路上，他精神奕奕，一面为部队做动员，鼓舞士气，一面为伤病员治病。他的夫人邓冠梅则为病人煎药。他俩为战士服务的精神，令人钦敬，在部队中传为佳话。

当年，听过他讲话的萧克老将军曾回忆说，大军进至宜黄，总指挥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恽代英、郭沫若讲话后，台前出现了一位须发微呈斑白略有老态的人。

萧克说，当时台下颇为惊异。我虽然在北伐及武汉政府时期，听到过这位华侨老革命家的大名，并知道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长，但没有想到他是须发微斑的人。在谈及蒋介石、汪精卫狼狈为奸、反共清党的罪行时，他怒不可遏。尤其在讲到一个月前汪精卫主持召开“清党”紧急会议，要清除共产党的时候，他激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的话给了我这个青年人多大的振奋啊！那时气候还很热，大家听了他的讲话，好像来了一阵清风，令人心爽。

军事失利后，彭泽民偕同夫人步行50多天，由江西经湖南进入粤东。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白天潜伏在农民家里，晚上行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转到香港。

在香港，他以中医为掩护，仍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工作。他曾对邓演达说：“孙中山逝世后，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上层分子中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个人孤掌难鸣，虽满腔热血，也无可洒之地。”他念念不忘革命，以行医为贫苦同胞和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实事。

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国民党反

动派逮捕。他得知后,忧心如焚,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蒋介石曾经通缉过他),只身奔赴虎口上海,与孙夫人商讨营救邓演达。

11月邓演达被害,他悲愤不已,赋诗痛悼:“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指蒋介石)冠带自峨峨。”

1933年,彭湃夫妇在上海英勇就义,他们的长子彭仕禄在海丰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叫嚷要斩草除根。彭泽民又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彭仕禄出狱,并帮助彭湃的亲属到香港避难。

身在海外不忘救国救民

大革命失败后,彭泽民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被国民党通缉并开除党籍。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抗战期间,他站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在海外进行民主救国活动,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1935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向华北发动了新的攻势。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救国。远在香港的彭泽民热烈响应,他和章伯钧等一道,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通过《临时行动纲领》。纲领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是一个为世人所震惊的事实”,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6年在寇深祸急关头,为坚持作狂澜逆挽之谋,尽匹夫之责,彭泽民在香港转而致力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他发表了《怎样动员华侨》一文,主张给华侨以参加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5月,彭泽民创办《抗战华侨》刊物,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新四军。

1939年1月,他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通电,声讨汪精卫通敌卖国的

行径。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旨在发动反共内战的罪行,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1946年5月23日,彭泽民接到周恩来的来信,信中说:

“泽民先生惠鉴:久违雅教,驰系时深。自日寇投降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目前东北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已演成大战,全国内战危机严重已极!人民权力自由到处遭受极大剥夺!扭转危局端赖全国民主力量之一致努力,庶下促使当局改变政策,和平民主乃有实现之望。时局如此,至望先生与华南民盟暨景然贤初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恩来与敝党代表团已于5月23日迁抵南京寓国府路梅园新村17号,尚祈不时赐教,以匡不逮,是所至禱。”

他不辜负共产党对他的信任 and 希望,从此奋笔疾书,一连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38篇,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

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打起来了,彭泽民怀着悲愤的心情发表了《侨胞应如何祝国庆》一文,大声疾呼,立即停战,实行民主!

由于他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蒋介石反动政府对他更加仇恨。1946年11月,国民党特务将他从行驶的有轨电车上推下去,当场摔掉两颗门牙,右臂骨折。

彭泽民极其愤怒,但毫无惧色。70岁的他以乐观的革命精神赋诗自勉:“老来何必伤迟暮,古木春归又出芽。世界沧桑问几许,认清猿鹤与虫沙。”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成为该党主要负责人之一。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5

月5日,在香港的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同民革、民盟、致公党等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是年12月26日夜,彭泽民与李济深、朱蕴山等20多位同行者,登上前苏联油轮“阿尔丹”号,航行11个昼夜,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翌日,彭泽民即与章伯钧等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拥护。22日,彭泽民又与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庄严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彭泽民与李济深、沈钧儒等35人进入北平。

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彭泽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新政协之所以能够诞生,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他在回顾农工民主党的历史后表示,完全拥护《共同纲领》和政协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表示,从此之后,“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着共产党,积极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尤其要在行动、工作和态度作风上,表示我们拥护的诚意。”

在人民政府中任职他最开心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中任职从政,是彭泽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期。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毛泽东特派彭泽民担任中央慰问团团长,率团赴豫皖灾区慰问。回京以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详细汇报灾情和救灾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

1952年7月,彭泽民受命代表毛泽东率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赴东北、内蒙慰问少数民族。他深入到林海鄂伦春、朝鲜等民族村寨和内蒙草原的蒙古包,送去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深切关怀。

1953年,他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亲

自出征,赴东北和中朝边界地区与国内外著名学者一道,共同调查美帝国主义投掷细菌弹的罪证。他一面徒步上山下山作现场观察,一面和许多证人谈话,并对聚集拢来的居民发表斥责敌人细菌战罪行的演说。他们在辽宁宽甸县发现的敌人投下的一个椭圆形的细菌弹残骸,后被国际科学委员会确认,成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毛泽东知道彭泽民对中医很有造诣,几次同他商谈改进和发展中国医学问题。他从事中医几十年,尤其精于张仲景的中医理论,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谈意见,情真意诚,言词中肯,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也不能搞一条腿,要搞两条腿,中西结合。”要他注意从事中西医学术交流的工作。

1953年11月,彭泽民参与筹组的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举行了成立大会。

翌年9月,他与毛泽东又谈起发展中医的问题,他说:“中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有着丰富的内容,如果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中国医药人才还很缺乏,团结广大中医的问题更显得重要。”毛泽东对他的见解十分赞同。

他把珍藏的中医理论家陈伯坛研究张仲景医论的专著,交给中央卫生部刊行,供更多的人研究。他在书后写道:“余既庆先生毕生之学得以流传,尤为中国医学灿烂发展之前途而称颂无已。”

晚年,彭泽民念念不忘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亟盼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1955年他为《华侨日报》题词:“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就表达了他的这一心愿。

1956年10月18日,彭泽民病危。

在入院之前,他自感病情严重,但他看到祖国的无限风光,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

在病床上,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说:“大局方兴,忍言归去?生机活泼,何用悲为!”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刘长春

——首闯奥运的中国人

● 英 武

中国不去，伪满抢着去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根据奥运章程，有权向奥运会派出参赛运动员。

然而中华体协是民间团体，没钱。于是体协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支持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第十届奥运会定于7月30日举行开幕式，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却在5月下旬突然宣布，决定不派遣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理由是“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体协很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伪满洲国那边传来消息，说他们已决定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伪满”，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由日本在我国东北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妄图借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之机，扩大其国际影响。消息首先刊登在伪满各报上，很快传到北平和天津。

据传，伪满那边已选定了运动员，而国际奥委会也已复电同意了伪满的请求，还要他们迅速提供“满洲国”的所谓国旗与国歌，以备届时升旗奏乐。眼看会期临近，国民党政府始终装聋作哑，中华体育界人士忧心如焚。为了挫败日伪的这一阴谋，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运动员。

伪满选定的运动员共两名，一个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刘长春，当时全国短跑纪录的保持

者；另一个是冯庸大学的学生于希渭，800米健将。

“苟余之良心尚在……”

提起刘长春，就不能不想起张学良。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在主持东北军政的时候，便积极倡导和扶植体育运动，希望国人有强健的体魄，以抵御外侮，振兴中华。那时，各省的体育大都举步维艰，而东三省的体育却红红火火。刘长春，就是在张少帅的热心培植下成长起来的体育尖子。

刘长春小时候在大连沙河口中心小学读书，他从小便爱好体育运动，一心想借体育发奋图强，压倒日本人。那时，中心小学与日本的一所小学隔街相望，放学之后，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经常打群架。刘长春在同学中年龄最大，打架时总是冲在前面。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民族仇恨可以转化成催人奋进的强大动力。他的短跑成绩提高很快，一次，在关东州举办的州内外中日中小学生对抗赛里，他年仅14岁，100米跑成绩便达到了11秒8，400米达到59秒，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学生的水平。在大连二中肄业时，他仍不忘体育运动，终日在谭家屯运动场（后为旅大市人民体育场）埋头苦练。1927年，在大连中华青年会主办的春季运动会上，他的100米成绩一下子提高到11秒，名列第二。这一年底，张学良任校

长的东北大学派出足球队赴大连比赛,发现了这个短跑健将。于是,刘长春辞去了大连玻璃制品厂学徒的工作,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学习,翻开了他体育运动生涯的新篇章。

张学良有眼光有魄力,经常邀请德国和日本的运动员到东北来,与中国运动员比赛,借此使中国体育健儿开阔眼界,了解世界体育强国的水平,迎头赶上。张学良还不惜重金,聘请德国田径队的队长留在东北大学当教练,月薪白银 800 两,专用小轿车一辆,马二匹。

刘长春在东北大学体育系发奋学习,经名师指点,长进非常快。两年后的 1929 年,第 14 届华北运动会由东北主办,会场设在东北大学运动场。刘长春作为东北大学运动员参赛,一举创造了 100 米跑 10 秒 8 的最新纪录。消息传开,中华体育界无比振奋。

随后,张学良特邀德国和日本的一流田径选手与中国运动员决一雌雄。当时的德国选手来自国家队,实力雄厚,是第九届奥运会的亚军。为了开好这次运动会,张学良在德国订制了镶有张氏本人头像的怀表,以备专门奖励各项运动的第一名选手。又拨款 25 万元,在沈阳的北陵修建了一个可容纳 3 万观众的运动场。

在这次运动会上,东北选手捷报频传,的确没有辜负张少帅的多年心血和满腔期望。100 米赛中,刘长春仅以一英寸(2.54 厘米)之差,落后于德国名将彦鲁特拉比尔,而战胜了另一名德国短跑健将。200 米赛,同样是德国人第一,刘长春第二,日本选手冈健次和今井,全被刘长春甩开了。男子 1500 米和三级跳远,也能与日本人见见高低了。来自哈尔滨、北平女师和东北大学的女选手们也身手不凡,使日本女将们惊讶不已。

为此,刘长春得到了张学良的特别奖励,由东北大学副校长刘凤竹亲手办理,每月发给他生活补助费 30 元。对刘长春这样一个穷苦的大学生来说,这已是很可观的经济资助了。刘长春也不负张学良校长的厚望,次年(1930 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他一人囊括 100 米、200 米和 400 米三项冠军,全国轰动。杭州市将通往田径场的大马路改为

“长春路”,以示表彰,激励更多的中华健儿发奋图强。

刘长春成了中华体坛的知名人物,他的成长过程和创造的许多纪录,日本人早就了如指掌。了解中国人,掌握中国人,从而征服中国人,这是当年日本侵略者的国策之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东北大学在张学良校长的安排下,已迁到北平。学生们先疏散回家,然后各自前往北平报到复课。事变后的第三天,刘长春返回大连老家。次日一清早,便有伪警察上门了,传他到局子里去问话。为了麻痹敌伪,他没有透露去北平复课的打算。

回到家里,刘长春要妻子连夜赶回娘家。第二天,他便乘船赴天津,去北平复课了。

儿子一走,刘长春的父亲赶快搬家,迁到 60 多里外的旅顺口居住。谁知敌人却咬住刘长春的踪迹不放,第二年的二三月间,日寇找到旅顺口来了,要家人写信给刘长春,劝他回大连。日寇许诺说:“只要回到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但没有提奥运会的事情。第二次登门,则明确提出要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只要刘长春能为“满洲国”争得这份“荣光”,他本人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刘长春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生来胆小,只有一面写信给北平的儿子,告之日寇再次登门的实情,一面又赶紧搬家躲避。这次,干脆搬到乡下去了。

这时,伪满将派刘长春和于希渭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已经在伪满各报上公开了。中华体协派人在北平与刘长春联系,《体育周报》也派记者采访。刘长春本是血性男儿,从小便仇恨日本侵略者,如今又身受流亡之苦,弄得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他当即在《体坛周报》上发表谈话:“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5 月初,又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另一名运动员于希渭还在大连,体协派人去劝说他入关。然而他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监

视,无法脱身,虽不能公开发表声明,却称病在家,拒绝出席奥运会。至此,日伪的这个阴谋便彻底破产了。

单刀赴会

当时的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他与校长张学良交往甚密,深知张学良不仅是东北体育的热情扶植者,而且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一位爱国将领。对于日伪借奥运要阴谋,张学良早已切齿痛恨。现在听郝更生说中华体协支持刘长春出席奥运会,但苦于没有经费,张将军当即解囊,捐助路费 1000 美元。又听说刘长春英语不甚流利,只身赴美,交往不便,拟约东北大学体育系宋君复教授同行,张将军又追加捐款 600 美元。

在 1932 年东北大学体育系的毕业典礼上,张学良亲自宣布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

这时,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了。报名的事情还没办妥。体育系主任郝更生急忙电告各方,以明真相;又电告外交部有无对付办法;又与中华体协王正廷(外交部长、体协董事)、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体协董事)紧急磋商,由张伯苓先生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和于希渭报名。一切事务均在几日内匆促办妥。

被困于大连的于希渭,原拟由大连乘船赴上海一道赴美,终因日寇的监视和阻挠,未能成行。

7 月 2 日,刘长春和宋君复教授到达上海,停留 3 日,办理护照和等候邮轮。上海各报都刊登了消息与照片,刘长春在中华体育场练习时,无数市民围观,各报记者紧追采访拍照,前来拜访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在东亚饭店,上海市 24 个团体近 2000 人为刘长春和宋君复饯行。电影公司赶来拍纪录片。新衣也连日赶制好了,是法兰绒上衣,左胸绣有中国国徽,白色的哗叽裤子,另有燕尾服和漆皮鞋。

7 月 8 日上午 9 时,身着国徽服装的刘长

春来到新关码头,即将登船赴美了。在码头上为刘长春和宋君复送行的有数千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王正廷博士,在浮桥上为刘长春和宋君复举行授旗典礼,授予刘长春国旗和体协会旗各一面,同胞们掌声雷动。

刘长春庄严地接过旗帜,作了如下答辞:
“我此次出席世界运动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

唐人街的盛情

船到檀香山,到港迎送的华侨数百人。他们久居海外,忽然见到祖国的体育代表,特别欢欣鼓舞。他们为刘长春和宋君复佩戴彩色花环,问长问短。从檀香山开始,一路上最亲的是华侨。

7 月 29 日下午 4 时,威尔逊总统号抵洛杉矶码头。第十届奥运会就在该市举行。

到码头迎接的有美国奥委会负责人,有中华体协总干事沈嗣良,还有中国留美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刘长春和宋君复下船后,乘上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大轿车,前往洛杉矶的唐人街举行欢迎仪式。到达唐人街时,汽笛长鸣,一时间,爆竹、锣鼓、汽笛和汽车喇叭响成一片,宛如盛大节日。

这时,已是 7 月 29 日了。刘长春 29 日下船,30 日,便要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开幕式,而且立即投入比赛。没有时间来恢复体力,适应环境,更谈不上赛前训练了。这位飘洋过海 23 天的中华健儿只能仓促上阵。

六人面对十万观众

1932 年 7 月 30 日下午,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来自 37 个国家的 1048 名运动员和 10 多万观众参加了开幕式。

31 日下午是百米预赛,他的起跑动作很漂亮,如奔鹿一跃而起,卷起一路旋风。他冲在最前面,甩掉了所有对手。

然而,他毕竟在海上飘行了 23 天,整日摇

荡着的甲板使他找不到脚踏实地的感受;如果说,他的起跑一鸣惊人,前70米一马当先;那么,他的后30米便渐渐力不从心了。离终点不到20米时,所有的选手都追到他前面去了!

他,是作为失败的英雄冲过终点的。第一名是星卜森,超前他3米多,成绩10秒9。而两年前的,他在沈阳创造过百米成绩10秒8的纪录,全国体坛为之轰动。

他能跑!太平洋折腾他23天,也只能把他的百米纪录折腾掉0.2秒左右。他是一条折腾不垮的硬汉。他心里明白,在洛杉矶只要有一个星期的练习,他就不致名落孙山。

休整一日后,8月2日,参加200米预赛。赛前刘长春作过练习,并在休息室里请宋君复教授为他按摩。这一次,他在体力、技巧和心理上的准备要充足些。起跑后直到170米时,他还位居第二。眼看只差30米了,胜利在望,然而又一次心有余而力不足,被人追上,名列第四。

然而,中国奥运史的第一页,毕竟由刘长春和体育界的志士仁人们揭开了。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竞技水平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但他尽了力,尽了心,无愧于这第一页。

辉煌体坛,辛酸人生

作为一代体育明星,刘长春的辉煌,不仅在于奥运的拼搏,更在于归国后的图强。

又是20多天的海上飘泊,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这时,华北已危在旦夕,他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在张学良将军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他组织了东北体育协进会,任总干事。这个体育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它通过组织各种体育比赛,把流亡在平津的东北青年(主要是学生)召集在一起,教育大家要团结起来,不忘“打回老家去”,要锻炼身体,准备战斗。遇到国内举行大型运动会,则组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体育代表队参加。其目的是唤醒四万万同胞,不要忘记日寇铁蹄下的4000万东北父老

乡亲,同时也是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东北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允许被列强瓜分。无论在哪儿比赛,刘长春都穿着“白山黑水”服(白背心,黑短裤),代表辽宁队出场。

1933年在南京举行了第五届运动会。在“东北体协”的组织下,东北运动员高举“辽、吉、黑、热”四省的大旗入场,全场为之振奋。就在这次运动会上,刘长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造了百米跑10秒7的全国最新纪录,并且保持了25年之久,直到1959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上,才被后起之秀打破。

1934年,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就在这年秋天,天津举行了第18届华北运动会。刘长春领着几百名东北运动员,高举“辽、吉、黑、热”四省的大旗进入会场,全场掌声雷动。就在这时,正对主席台的看台上,以南开大学为主的几千名学生用黑白颜色组成了五个大字——“勿忘九一八”!几万人的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同仇敌忾的火焰,燃烧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第二天,看台上出现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全体东北运动员是含着热泪参加比赛的。

中外体育运动史上,像这样悲壮而又热血沸腾的场面,可曾见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长春仍然坚守着体坛阵地。他几乎独来独往地应付国内的各种赛事,不幸在一次训练中扭伤了大腿。1938年,刘长春在长沙失去了工作,悲愤交加地退出了体坛。这年,他才29岁。10月间,长沙大火,他的全部衣物和纪念品都化为了灰烬。

(责任编辑 吴思)



寻访肖逸烈士遗踪

● 郭 锋

4月15日,是肖逸烈士的忌辰,我从天津匆匆赶到太原,到牛驼寨烈士陵园的肖逸墓碑前,献上了一束五彩的花。作为与他曾同在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当过随军记者的我,同时也代表了我才去北京采访过的他的另两位战友——原二十兵团新华分社社长杜导正、原十九兵团新华分社社长张帆,以及他的爱妻沈霞的弟弟沈霜同志,向肖逸烈士在天之灵默默的三鞠躬,表达了对一位战友的沉痛追念。

1948年,我从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二纵队五旅调到新组建的六纵队(即后来的六十八军)新华支社当记者,正值肖逸同志任社长。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交往是早已开始了的。我手头的一封晋察冀野战分社评论我一篇稿件的长信就是他写给我的。在六十八军,我参加了进军绥远及其以后的平津战役中包围、攻占张家口的战斗。这期间,我从前方采写的稿件大都经肖逸处理,由新华社发表。打下了张家口之后,我调二十兵团新华分社,随后就是华北三大主力兵团会师太原,准备拿下敌人在华北残存的这一最后据点。因为是三个兵团联合作战,需要组织一个报道中心,二十兵团就选派肖逸参加。他到了十九兵团六十三军阵地双塔寺,听说敌军一个连长要投降,我军派敌工干事前往接应,肖逸即跟随采访。不料这是狡诈的敌人耍弄的一个阴谋。敌连长露了一下头就隐匿起来,我敌工干事在我军占领的一个碉堡的机枪枪眼后面用喇叭筒向敌军喊话,站在一旁的肖逸夺过喇叭筒也喊了几句。这时埋伏在对面百十米的敌狙击手瞄准枪眼射击,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肖逸的前额。他当时只有34岁。

为追寻烈士的遗踪,我去太原凭吊前,先

去了一趟北京。首先找到了杜导正同志,他向我讲述了上述情况,并谈到他得知肖逸牺牲的消息之后,立即派分社编辑林呐去料理后事。林呐将肖逸的遗体埋葬在刚刚解放了的双塔寺西北二三百米处的一块黄土地上(旁边有两座二三人来高的塔形建筑)。林呐同志亲自挑选石料,用朱笔正楷书写了杜导正代兵团政治部草拟的墓志铭,并请来石匠凿在墓碑上。肖逸烈士的遗物,包括一篇万把字的长篇小说,开头无题,和他在北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岳父茅盾先生时的照片,由张帆同志写信转交给了茅公。另有一支杏黄色塑料杆的派克笔,和一本肖逸生前自己装订的日记本——把一叠叠白报纸用线串联在一起,封皮是用绿布包好的硬纸壳作成。——这两件遗物,组织上交我保管,从其记述中我得知肖逸同志深深爱着他的亡妻,直到他牺牲前几天,还梦见了先他四年而去的沈霞同志。这本日记我保存到由部队转业来天津之后,给茅公邮去了,他很快复我一函,告我日记已收到,表示感谢,并嘱我有机会去北京到他家作客。

这次寻访中,难能可贵的是,我找到了茅公的儿子沈霜同志。我先从天津写信与他联系,得到了他寄给我的十分珍贵的肖逸和他姐姐在延安结婚后的合影,以及他姐死后,肖逸独自凝神注视他爱妻遗像的照片。沈霜同志在信中说:“肖逸是江苏南通人,抗战爆发后从上海去延安,一度任周扬的秘书,后在编译局下属的俄语专修班学习,并与同在该校学习的沈霞(我姐)认识。几个月后,肖逸调到边区文协工作。肖逸与我姐于1945年上半年结的婚。日本投降,延安的干部要去各解放区。沈霞将去东北,但发现怀了孕,于是去医院打胎,却因

手术事故（转为腹膜炎又未及时发现）而去世。肖逸于同年9月离开延安赴晋察冀。”沈霜同志在信中还告诉我：“我姐姐和我是1940年6月随父母到的延安（笔者注：据赵明回忆录称，茅盾先生一家四口在新疆迪化，为逃离盛世才的迫害，曾去延安），姐姐先在女子大学，后转到俄语专修班。我原名沈霜，1947年去东北时改名韦韬，现已离休。”“肖逸于1949年4月15日在太原前线牺牲，这消息是张帆同志写信告诉我父亲的。”

根据这一线索，我去北京又专访张帆同志，他为我提供了两份珍贵资料。一是他在《新华社回忆录》二卷中发表的《肖逸在前线》。文中写到1945年肖逸来晋察冀后，被分配到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和《晋察冀日报》采访科。当他向张帆同志报到时，特别提到：“我原来是搞文艺创作的。工作需要么，叫我当记者，我服从分配。”他工作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解放战争爆发，就奔赴前线，深入连队，一直和战士生活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写了不少好的通讯报道，据统计共有16篇。他参加了晋察冀战场上所有重大战役，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平津战役后，他在北平见到了岳父茅盾，曾表示希望留在北平从事创作，茅盾先生鼓励他参加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样才能写出反映解放战争的好作品。他在岳父的启迪和鼓舞下，愉快地重返前线。

张帆同志为我提供的第二份珍贵资料，是发表在198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的茅盾同志的一封信原件及张帆就此信写的文章。原来张帆在肖逸牺牲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4月16日，就写信将此噩耗告诉了茅公。茅盾同志5月2日回信写道：“肖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这

样直呼大名），我想您也和我一样，觉得肖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肖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肖逸的朋友在此间者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您的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

诚如茅公所言，在肖逸同志牺牲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断有他的战友来他的墓地凭吊。杜导正、张帆数次在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马明陪同下来此凭吊。1982年深秋，年过六旬的林呐同志从天津专程来太原寻访肖逸墓地，可惜的是他亲笔写了墓志铭的那块石碑，早在“文革”动乱中不知去向了。1988年5月，由肖逸同志生前战友杜导正、刘贯文、张帆和马明等同志倡议，以新华通讯社、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和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名义，在纪念太原解放40周年时，为肖逸烈士重建新碑。在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及市城建委的大力支持下，这座由张帆撰文、傅业书写碑文的新的墓碑，于1989年6月2日，在牛驼寨烈士陵园揭幕，山西省城新闻界近百人参加。这座碑树立在同样遭敌暗算的爱国将领、原国



肖逸与沈霞（茅盾女儿）在延安结婚后的合影

民党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和我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的墓碑旁,他们是在计划好要在太原起义时被戴炳南告密遭阎锡山逮捕解送南京后被蒋介石杀害的。他们与肖逸同志相处,一定有诉不尽的冤仇和遗憾……

我这次赴太原凭吊肖逸烈士,不仅去了他当年牺牲及临时埋葬其遗体的双塔寺,还特地去了当年我随二十兵团首先突破太原城小北门的地方,刚好这里有一段保留的城墙,引起我许多的回忆:当年我解放军1300多门大炮朝太原城猛轰,三个兵团从四面八方12个突破口同时发起总攻。六十六军的两个连队争相把云梯靠在小北门以东二百多米的城墙上,一连梯子组的战士孔祥元没等突击组上来,就首先登上城头,荣立登城第一功。我在六十八军的另一战友——摄影干事李光曜也在打太原中牺牲,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和他及另两位战友在河北农村拍摄的照片。这次我还在无意中从马明同志的一篇报道里读到了他牺牲的简

要情况。原来他在攻占太原北门的激战中,腿部受敌炮弹重伤,出血过多,经抢救无效而牺牲。他是江苏镇江人,肄业于上海大学农学院,1949年参军,终年24岁。据牛驼寨烈士陵园讲解员小贾介绍,这座陵园埋葬的解放太原牺牲的烈士,有名有姓的1265名,无名的631人,而这还不是打太原牺牲者的全部!

我来太原前去北京的那一趟,专程登门拜访了沈霜同志。他热情招呼我进屋,向我介绍了在延安四次见到肖逸的情况:一次是在他所在的西北文工团驻地,肖逸与其姐尚未结婚,随后其姐去肖逸深入生活的农村结婚,未通知亲友。二、三次见面是在其姐病危时和她的追悼会上。第四次是在一个山沟中意外相遇,肖逸背着个挎包,跟着头毛驴,告诉他:“我走了,去华北。”匆匆地只说了一句话。

(写于1997年,重改于2001年中共诞辰80周年纪念日前夕)

(责任编辑 洛松)

《柔石故里仰高风》一文中的引诗系张恺帆所作

编辑同志:

第5期《炎黄春秋》76页《柔石故里仰高风》,引用柔石写的诗纪念“二七”殉难烈士。非也。

这首诗建国后被认为是烈士佚名之作,收录在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后来萧三发现是无为县张恺帆所作,特写信向他致歉。恺老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当年,我曾在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了解这首诗的由来。1933年4月张恺帆同志受中共江苏省委外巡部派遣先后任中共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同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在吴淞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1934年2月7日,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胡也频五位烈士被害三周年,张恺帆化名“扞虱居士”,赋此诗以悼之。随后,他又在狱中和难友组成“扞虱诗社”,吟诗作词,以抒发革命情怀,表达要扞尽人间臭

虱的坚强意志。

恺老还在人间时,我曾将此诗连同《哀悼吕惠生》、《有感》、《“文化大革命”随感》、《步李煜韵》等诗词,奉送恺老审阅。此诗为: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志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他在审阅这首诗时,将“志未终”易“终”为“穷”。我的理解,“穷”比“终”含蓄。《后汉书·马援传》:“偿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列子·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这两处“穷”的意思都体现在“志未穷”的“穷”。

恺老在抗日初期被保释出狱。

1997年4月贵刊载俞乃蕴写的《张恺帆铁骨铸诗魂》,可供参阅。

读者 胡野坪

另:本刊《柔石故里仰高风》一文中,柔石故乡宁海误为海宁。该文配图的说明应改为:“鲁迅录柔石在狱中写给冯雪峰的信”。谨此更正。

编者

缅怀“纯人”汪润

● 徐光耀

我们河北省有一位不大为人知道、也不常为人提起的作家——汪润，突然去世了。他奇迹般地活了八十七岁，真令人不可思议。

他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确实知道。一群孩子发现他该开门时许久不开，爬到房后头去摸他的烟筒，很凉，这才觉得不对，猛敲他的门无应，于是撬开了窗户，他们看到：汪润光着身子坐在床上，两脚支地，已经“坐化”了。

此时正是2001年2月9日11时，保定的气温在零度以下，院子里冰雪遍地，水管子还冻着。

据推测，他该是凌晨起床时，突然地“走了”。

本单位开离退休老干部会，主持过汪润丧事的克灵同志提到此事，介绍了这个情况。于是大家在惊愕之余，七嘴八舌地扯起汪润来。

汪润是郭沫若的同乡，四川乐山人。1938年参加革命。他到过延安，做过共青团工作，给一位高干当过秘书，而大部分时间是在文艺圈子里打转，曾长期“下放”到平山老根据地的山沟沟里“锻炼”。我跟他有一面之识，是在文学研究所一同学习过。他常头戴一顶鸭舌帽，脸上有几颗浅麻子。四川话说得并不流利，偶尔发一声温吞吞的笑，论印象，仅此而已。

第二次再见汪润，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文革”刚结束，我们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像才从蛰居土里钻出来的虫子，东爬爬，西爬爬，四处探看亲友。我是去号称“省委小杂院”里看

一位朋友，不意撞着汪润，只好到他屋子里坐了一坐。

这是一排工棚似的（也许原就是工棚）小南屋里的一间，约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床头顶着个二屉桌，当地垒着两个用报纸包着的炮弹箱子，包得四棱四角，很是平整。木箱上空，吊一个小灯泡，戴着也是报纸糊成的喇叭形灯罩。沿着南、西两墙，还放有两只破箱子，扔着些衣服、报刊、书籍之类。墙角里是一只桶，泥火炉和几根烟筒。我正犹豫坐在哪里为好，汪润指着炮弹木箱旁边一个半尺高的小板凳，很热情地招呼道：“坐，坐！”

屋子里又黑又闷，惟一扇北向窗户，也用报纸糊着，光线只从门口射进来。我问他伏在哪儿写作，他指指炮弹箱，而我蹲坐着的这个小板凳，便是他的交椅。

当时觉得，这一切，都是“文革”的罪过，比起别人来，他更显得窝囊罢了。谁知又二十多年过去了，像他这个级别的人，普遍把自己的四居室装修成宾馆式、酒吧式、宫殿式的时候，他竟死在这间陋到无可再陋的小屋里，情形没有任何变化……

老干部们的七嘴八舌，使汪润的形象越来越古怪了。他是文联作协的作家，在刚有离休说法的时候就离休了。从那一刻起，他拒绝组织上的一切照顾和福利。逢年过节，单位总要派人去探看探看，总要带点烟茶果品之类，可汪润一概不要；非要给，他就苦苦哀求，说他不



汪润

再是给国家做贡献的人了，不应再花人民的血汗钱。若问有啥问题或困难，回答是一概没有：房子，不需要换；亲属，不需要调来一块；孩子，他自己能管；有吃有穿，身体很棒，请组织上一切放心。他省吃俭用，除米面之外，小屋里只有一罐子自制的“泡菜”，可他从不报销药条子。有一年，忽感头昏眼花，浑身到处不得劲，到医院去一查，医生说，你什么病都没有，就是缺乏营养。证明他的“身体很棒”的确不是假话。

他也常常外出，上山下乡，到处采访，尤以深山里的老根据地去的最多。自带自吃，徒步行；实在走不到的，挤公共汽车。他还邀请朋友们就伴儿，所有食宿路途，都由他掏腰包。朋友们劝他，车票应该留起来，机关上可以报销的。说这话的工夫，车站上就有人把乱扔着的废票拣集起来，拿回自家单位去报销领钱。可汪润不，他所有的票证都飞了、扬了。

伴他外出的人越来越少了，不是有什么不痛快，而是服不下他那份辛苦。于是他就一个人去爬山，以致有一次从悬崖上失足跌落，恰好落在一棵大树上，叫枝条挂着摇荡了大半

天，有个老乡走来看见了，他才得以生还。

汪润老早就是文艺五级，每过几年，总要碰上调资晋级。可汪润一律不许给他调、给他增。他说，衣食不愁，有住处，免费看病，很够很够了，不如省下钱来，多给劳苦群众办点事。组织上跟他讲不通，只得把工资寄给他在北京工作的妻子，由妻子斟酌变通，发给他生活费。至于人人有份的奖金和其他福利，他更是一律闭眼，滴水不沾。多少年来，人们说着这些，笑着这些，有同情，有怜悯，而更多的却是对“君子之风”的轻蔑和讥讽。汪润其实也能感到，但他向来不以为意。

作为一个作家，尽管他很努力于生活资料的获得，很想写写大时代的农村，还曾大力搜集过抗日回民英雄马本斋的故事，但他作品的确不多，在“大跃进”年份，我读过他一个短篇，题目叫《曹金兰》，是报刊上正轰轰烈烈向这作品开炮，我才找来读的。如今，除了炮轰理由很令人糊涂这一印象外，内容、形象都不记得了。但要说他这样一个人，能兴出什么“反党”的“主义”来，才真是活见鬼了。然而，也许另一件事与这次炮轰有联系：是他曾去大红大紫的“共产主义试点县”徐水下乡，原意是要探视一下天堂，而打眼入帘的竟然全像地狱，便忍不住嘟哝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据说比当时正要被开除党籍的刘真更为“过激”。炮轰的结果，政治问题不算，在最后“鉴定”上，连他一贯的艰苦朴素作风，也断为“是假的”了。

人，无论怎样怪，总是有自尊、有感情的，他之至死不肯随机关迁来石家庄，该不是平白无故的，他何爱于那间如此破烂的小南屋呢？

老早人们就传说，汪润的夫妻关系不好，证明就在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有人甚至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离婚？

汪夫人郭谦同志带着女儿急急奔丧来了。大大出人意外，她们抚尸大恸，伤心眷恋，不可遏止，表现了极为深挚的感情。使各种流言，即刻烟消云散了。她们确也不愧为汪润的亲属，对丧事，秉承着汪润的一生意愿，不提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只求一切从简，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经办人员感动得无可奈何，尸

体火化后,特地动员她们说:汪润同志生前为国家省了很多钱,大家心里一直无法补报,在这最后时刻,让他享受个高级骨灰盒吧。而火葬场的骨灰盒分十二个等级,从几十元到大至几千元不等,母女俩挑了半天,越过最差,挑了个“十一级”,总算给经办人员留了一点“安慰”。

汪润没有留下遗嘱或遗书。几个邻居孩子一齐帮着翻找,“搜”到的现款是3000元,还有张1.2万元的存折,夫人郭谦认得,是她往年留给老伴以备急需的。然而,老干部科又拿出一张1万元的存折来,交待说:这是1996年,省里发了特大洪水,报纸上呼号捐款救灾,汪润听说老根据地的平山,平地的淤泥有一尺厚,于是倾其所有,捐了1万5千元,这数目甚至超过了单位捐款的总数。当时组织上考虑,汪润一向极度节俭,老而独居,又无额外收入,如此彻底地“掏家底”,倘若将来万一出个事故,怎么得了!但要退款,又明知商量不通,便“自作主张”,背着汪润只捐了五千,扣下1万,以防汪润的万一。而今,“万一”不须防了,当然要物归原主。

汪润的葬礼非常干净,没有仪式,没有花圈,没有松枝、挽联、布幛,甚至没有讣告,因为连亲属也不知把讣告送给谁,即使他多年资助上学的贫苦子弟,也弄不出一个稍稍完备的名单。据知情人说,汪润差不多从抗日时期就开始资助穷苦的山区孩子上学了,对象多限于房东和老堡垒户;解放后一直持续着这项活动,成了他的传统“产业”。但他从不张扬,所以究竟资助过多少,也就无人晓得,人们只是偶然碰见有受资助的孩子找他汇报学业,才知道有这么一码事。就在汪润过世后的几天中,还有个受过资助的青年打电话给郭谦,打听汪润的情况,通话中他突然问:“郭老师,您怎么声音不对,出了什么事吗?”郭老师怕他悲伤,假说:“小有感冒,什么事也没出”。搪塞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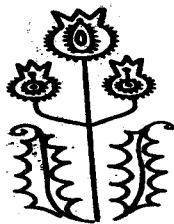
至于汪润的遗产,诸如遗著、遗稿、资料、书籍之类,亲属决定,稍加整理后,将全部移赠河北文学馆。再剩下的,就只有这间小南屋了,说来也奇:小南屋所在的这个长条小院,原是

河北省委的,省委一迁走,这儿住着几户“残留的尾巴”,年长日久,省委已忘记了这块不值几何的“遗产”,而“尾巴”们也各奔东西。因为不是本市的地产,保定市没有想过要经管或改造它,这才使汪润一以贯之太太平平地住了下来。然而,郭谦同志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论理应分三间居室,但由于还有丈夫在保定的一间房,她只能分得两间(据说是很清丽雅致的两间)。看来汪润的灵魂仍须住在这里,以便为他如此善良的妻子守护这间珍贵的小屋。

啊,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八十七年生涯的汪润,终于永远地走了!就像一滴清水落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渗入泥土,片刻之间,不留一点痕迹,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们离退休老干部,也只有叹息、感慨、擦泪,虽各自心中都不免榨出自己的“小”来,但没有一个人能概括成一句话,说明汪润算个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竟禁不住把他叫做“纯人”,而且是早该死掉的“纯人”。他1938年参加革命,在经历过如此之巨的地覆天翻、波谲云诡的现实大变革之后,他竟不为任何时代冲击所动,仍在铁定不渝地信守着他的革命初衷和美好理想,一直把精神留在六十年前的世界里。他不孤傲,而很谦和;不愤世嫉俗,而很从容自信。但他的单纯,他的纯真、纯净、纯粹的品行,实在是不合潮流,不识时务,别说各种腐败,就连贪、馋、懒、占,也入不到他的梦中,金钱利禄,淡到零无。从而被人视为“古怪”,并常加以嘲笑。由“精明”一族人看来,他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吗?

呜呼!惟愿我们的汪润同志在他那美妙理想的精神世界中永远安息!……

(责任编辑 程 度)



十年功夫非寻常

——庆祝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侧记

● 严久惠

北京的五月,鲜花盛开的五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5月2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与会的在京各界人士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团体会员代表共300百余人。

研究会会长费孝通、程思远,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等出席。费孝通在致辞中说:“在这个研究会成立的十年间,由于时代的要求和国人的努力,我们在‘文化自觉’上有一定的收获。”他回顾说:“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不仅表示了大家对自己的悠久文化更加关注和重视,而且愿意通过组织起来对它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一向所说的‘文化自觉’。我们决心对自己的文化具有自知之明,为的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的变化有自己的选择权和自主权。这个‘文化自觉’的意识是得来非易的。”

李宝光副会长代表常务理事会作了有关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十年工作回顾与今后展望的报告。报告的文字虽平实无华,十年耕耘的艰辛,十年收获的喜悦,却也尽在其中:

——由研究会主办和与团体会员、有关单位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达三十余次。研讨内容所及:“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闽台文化的历史渊源”、“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孙中山与现代文明”、“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与企业文化”、“中国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世纪之交,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在回

归后的香港召开了“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提出举行“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倡议,并已于2000年在北京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为题,成功地举行了论坛的首次会议。

——在执行会长萧克亲自组织和领导下,百余位专家学者历经八个寒暑,编撰出版了十典百志,共计四千余万字的《中华文化通志》,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8年11月9日,江泽民亲切接见萧克和部分主编、作者,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江泽民说,这套书为后代研究中华五千年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成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建馆250周年之际,应该该校校长请求,江泽民主席又委托我国驻美大使将一套《中华文化通志》,赠送该校图书馆。研究会还从1996年起着手编纂有关炎黄时代及其历史文化的八卷本资料丛书《炎黄汇典》。这套由程思远任编委会主任,李学勤、张岂之任主编的丛书,将于年内出版。

——研究会宣告成立不久即创刊的纪实性月刊《炎黄春秋》,今年七月也满十周岁了。十年来,该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爱国大团结的方针,遵循“求实存真”的原则,对于古今重要人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功则功,过则过,力求全面反映其本来面目。正因为如此,它不仅吸引了一批知名的作者,更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信赖与好评。从

1994年起,《炎黄春秋》的学术增刊《炎黄文化研究》,每年出版一期,辟有“中华文明探源”、“炎黄二帝研究”、“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思潮与学派”、“中外文化交流”等富有特色的栏目,发表了不少老专家和崭露头角的新秀的有分量的文章。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成为研究会联系各界人士,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研究会与黄埔同学会联合邀请当年参加抗日的老将军、老战士(包括原国民党爱国将领),共同追忆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的岁月,与会者在重温胜利喜悦的同时,强烈表达了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共同愿望。1996年开始的《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包括拍摄电视专题片《长征纪事》、出版《长征大事典》、营造红军林以及学术研讨、文艺演出等,目的是,昭示世人勿忘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人间奇迹,希望国人以红军的长征精神,完成振兴中华的新的长征。书画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奇葩,又是传递感情的信使。研究会多次组织书法家、画家,挥毫泼墨,为香港回归致贺,对建设大西北的人们表达关爱;海峡两岸中华书画的巡回大展,更拉近了两岸同胞的距离,增进了亲情、乡情、

恋念祖国之情。

十年成果难以尽数,不争的事实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赞誉。著名学者张岂之教授代表学者同仁在大会上发言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之所以在十年时间里取得很大成绩,除了各级领导支持,全体顾问、理事的努力外,重要的是由于会里的一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发挥了带头作用,将事业摆在首位,不计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扬民主,顾全大局,营造了很好的会风。正派的会风和实干精神吸引了一批学者、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总之,正派的会风,正派的学风,正派的工作作风,这就是研究会十年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

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等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黄帝陵基金会会长孙天义专程来京,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代表该会向大会致贺词并敬赠轩辕圣匱。

轩辕圣匱是以国家级文物西利匱为基本型制,赋予炎黄子孙崇敬始祖、怀念故土的新意,精心制作的特殊纪念品。辛巳年农历二月二日敬采黄陵桥山圣土,盛于轩辕圣匱内。

江城子

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成立十周年

● 胡吉祥

丹心一片报炎黄。志昂扬,谱华章。建会十年,美誉震遐荒。为使神州流异彩,龙献瑞,凤呈祥。

中华两制固金汤。步康庄,路修长。不累浮云,心底有朝阳。大汉天声呼一统,开新纪,铸辉煌。

《炎黄春秋》的春秋

● 杜 导 正

《炎黄春秋》月刊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史为主综合性纪实杂志,由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今年创刊十年了。这个杂志,对中国历史尤其对近代现代史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论述,力求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争取给人留下一笔观点正确,真实无误的史料。

《炎黄春秋》每月一期,十几万字,到今日已出版一百一十二期,二千四百多篇文章,一千四百余万字,自然不可能篇篇是佳作,平庸和失误的文章是有的,但它在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特别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是鲜明的,它恪守史德,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探索了,努力了,尽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斯文点说,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通俗点说,即对事对人,说实话、说真话,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遗憾的是我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特别是对近代现代人物、事件的评述,曾长时期受到一种非科学态度的影响。譬如谈中国现代史,共产党以外政党社团的积极贡献,我们过去是很少提的;讲到我们自己呢,说红军,主要歌颂一方面军,对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便少提。说人物,主要歌颂毛泽东同志,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对其他党的领导人则很少提;说毛泽东又是只讲正面,只讲伟大,不说他的缺点、错误与教训。说我们的党呢,只能讲成就与经验,如果讲缺点、错误与教训,便好像是给自己脸上抹黑。总之,这种片面的、非科学态度,有很长一段时间,泛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史学领域更加严重。这种状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了很大改观,但那种非科学看人待史的心态仍残存着,直到今日。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践十年后的大背景下,去述史述人的。这个大背景,是党、国家、人民对待一切事物客观了,宽容了,杂志和作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激发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主流方面。但非科学的条条框框,还是有的,周边环境有,编辑部和作者自己的头脑中也有。这就使杂志十年来在叙事叙人时,不免发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有时处境相当困难。总体看是进三步退一步,但毕竟前进了。读者满意的正是这一点。十年中,如现代史部分,我们主要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但对其他党派在历史上某些阶段某些方面的积极贡献,我们

也予以肯定。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呢,自然用大量篇幅作了歌颂,但对其执政后的失误与教训,也作了积极的痛切的反思,比如,对反右派、庐山会议、“三面红旗”和“文革”等,都作了相当客观的报道。即使对中共划时代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这个杂志是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对于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有关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大量的宣传,同时对于有待加强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杂志也发表了若干篇探索性的文章。其它如对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黄克诚、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项英、潘汉年等,都给了相当篇幅,记叙了这些曾经蒙受诬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业绩。

对中国现代史上曾有争议但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如胡适、梁漱溟等,这刊物也力求客观地就其功过是非作实事求是的反映。

对胡耀邦的叙述,可说最典型了。胡耀邦,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4月病逝。中共中央在胡的追悼会上给他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至今日并无一字更改。胡和其他伟人一样不是完人,有失误,但他一生,尤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作为邓小平、陈云、叶帅的左右手,作出了大量为众人称赞的业绩,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三项决定性工作中,他是具体操作的前线总指挥。1989年后,不少出版物,对胡耀邦的功勋不说了,少说了。这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人民群众要求给胡耀邦以全面的评价。《炎黄春秋》于1994年4月,在耀邦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在封二登了几幅照片,发了急就章的几行白话诗。据我们所知当时在北京这是第一家,读者反映非常好,受到读者的称赞。此后,我们更主动更有计划地组织了胡耀邦业绩的系列文章,突出地反映了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上的赫赫功劳。几年来,我们发表有关胡耀邦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等文章,达十几篇之多,受到读者的好评。

《炎黄春秋》对事对人这种求实存真的精神,加以文章涵盖面非常广阔,上下几千年,纵

横几万里,凡符合宪法,凡有利于爱国进步团结的文章,均可发表;它又以纪实作主要体裁,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这样就使它受到广大读者,尤其老干部老文化人的欢迎。我国一位无党派人士、知名社会活动家,不久前曾书“求实存真,言之有物”八字赠编辑部。这些话对于我们确实是过誉了,但反映了读者对我们努力的认可。读者希望我们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不能辜负读者,我们会这么办的。我们工作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少读者对本刊也有所批评,我们愿继续在上级和作者、读者监督下努力改进。

我在本文的前面,反复阐明《炎黄春秋》在反映历史事件与人物时,尽力做到秉笔直书,说了些真话实话,给人以启迪,所以能如此,因素很多,根本的决定性的是办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得大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发扬。其次,就是这个刊物从创刊到今日,得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的鼎力支持,吸引了百名左右高层次的撰稿人,他们或是资深的革命家,是所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有关事件与人物有深入研究。这就使本刊所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史料价值。作为《炎黄春秋》的编辑者说,多数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不平凡历史的老文化工作者,有一种求实的作风,有一点大无畏精神,没有这样一些同仁的努力,也是办不到的。

文章写完了,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用《〈炎黄春秋〉的春秋》这样的标题呢?这得说两句。《炎黄春秋》这十年,从组织、撰写和编辑文章,从印制发行,到经营管理,实在说,其中困难、曲折、微妙以至辛酸处很多很多,几千字也写不完的。只是总体上顺利多于受挫,喜悦多于苦恼,虽然跌跌撞撞,但走过来了,越走越好。还有呢,人总是往前看么,今天又是本刊创刊十周年的欢庆日子,所以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将那些不很愉快的事抹平了,抹淡了。但《炎黄春秋》的历史确是一部坎坷的“春秋史”,标题用“春秋”二字还是贴切的。

风雨沧桑 一树晴霞

——记中国画艺术家汤文选

● 汤 立

汤文选，号拳石园主。1925年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喜爱常挂于厅堂的古画。这些画大多是渔樵耕读、八仙过海、万事如意等。七岁时，汤文选已能仿摹这类较为复杂的古画，竟然颇得形似。父母见之，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常常夸他为颖悟少年。

十岁时，父亲送汤文选上县城中心小学，十一岁时，他仿摹一幅八仙过海中蓝采和替铁拐李挠耳朵的画面，那铁拐李被挠得耳朵奇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神态惟妙惟肖，令观者称奇。

1937年，日寇侵华，县城沦陷，12岁的汤文选回到乡下，先后师从乡儒姚秋成、汤子书先生读私塾，有一次，姚先生出上联“火花四迸星横列”，汤文选对的是“云屑西飞月倒流”，老师大加夸奖。

1946年，汤文选进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开始系统地学习国画理论与技法。当时的教师有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等，他们都是很有成就的画家。汤在老师的指导下，拼命地吮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

武汉解放前夕，汤文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安排下做了一些迎接解放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文化界对于基本保持旧面貌的中国画，能否反映现实生活，能否体现时代精神，一直存在着各种学术思想上的争论。民族保守思潮不承认一切新的尝试和探索；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则认为“中国画不科学”、“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应取消中国画”。持这两种极端思想的人士，谁也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能使对方认同的作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画一时处于十分沉寂、尴尬的境地。

而此时的汤文选正躊躇满志，出于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片赤诚，凭着自己艺术上的天赋及多年刻苦用功练就的本领，跃跃欲试。当时，他在武汉市青年文工团从事布景绘制工作，工作之余，他以国画、年画、

连环画、宣传画的形式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不时在北京、武汉报刊上发表。

1951年，汤文选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素描，有幸聆听徐悲鸿等艺术大师的教诲。他还学习、研究当时苏联油画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

1952年至1953年，汤文选被分配到《长江日报》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并下农村参加土改，当过冬学教员。这些现实生活的体验，给汤文选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反映农村新生活的国画《农村四季》、古典题材的国画《刘海砍樵》和少儿题材的连环画《罗文应入队》等，这些作品均由当时的中南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他画了多幅中国画、宣传画寄往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他也画了大量农村题材的国画人物写生。从这些作品看，此时的汤文选已经能够用传统的笔墨形式和新掌握的造型手段，准确而生动地刻画现实人物了。

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青年画家的汤文选思想敏锐，才华横溢，在中国画坛充满活力。他的作品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据北京裱画师刘金涛先生回忆，1953年，徐悲鸿有一天来到其裱画间，兴致很高地对刘金涛说：“青年画家中，我发现了两个人才，一个是黄胄，一个汤文选，这两位青年将来大有作为。”

1953年，汤文选调至华中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同年底，他完成了《婆媳上冬学》的创作。这幅画在全国画展中被评为一等奖，原作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还应文化部委托，重作一幅送前苏联文化部，苏联艺术家刊物专文评介；国内50余家报刊纷纷刊载，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也将其收入。

1955年，汤文选创作的《喂鸡》参加全国画展，原作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在苏联艺术刊物上发表。1956年他创作的《说什么我也要入社》、《送粮路上》参加全

国画展,均为中国美术馆收藏。《说什么我也要入社》在《中国画》创刊号发表。

1957年,邮电部首次发行美术邮资信封,其美术原图均为当时中国画坛名家大师作品,而《婆媳上冬学》列入了中国首枚美术邮资信封。

20世纪50年代,汤文选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悟和对传统与造化的深层次把握,以时代精神塑造新人,开启了时代之先,成为当时开一代新风的青年画家,迎来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高峰,也为建国后具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中国画艺术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7年,汤文选赴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收集了一批创作素材,回汉后正在筹办写生展时,厄运突然降临。这位“紧跟时代的著名青年画家”,一夜之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下放农村监督改造。在一次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一根粗大的木头压断了汤文选第十二根脊椎骨,留下了终身伤残。

在生命最艰难的日子里,是艺术给予他生存的希望。劳动之余,他仍然忘情地拿起画笔,白天不能画,他就夜晚偷偷在油灯下画。他画喂猪老农、画放鸭青年;他还画了大量猪、牛、羊、鸡、鸭、鱼等速写。

1961年,汤文选回到湖北艺术学院任教,担任毕业班的创作指导老师。他一面从事教学,一面继续人物画创作。1963年,他创作的《天高任鸟飞》参加全国美展,并入选《现代人物画选》;1964年,他与人合作创作的《白手起家》四幅人物画,参加全国美展后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还创作了国画《平岗细草》、年画《年年有余》,均为出版社出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汤文选受到冲击,他创作的人物画被上纲上线,批判为“反革命毒草”,他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农村。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均受到牵连。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汤文选重新回到了创作岗位。他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创作了《土家山寨春意浓》、《山乡春早》、《谁持彩练舞云端》、《红日照丹江》、《武当晨曦》、《战天图》等一大批现代山水画作品,在山水画领域取得了相当成就。

1978年,他被邀参加文化部国画创作组,赴北京颐和园藻鉴堂作画。

1980年,汤文选再次应文化部之邀赴北京藻鉴堂作画,同时作画的画家有朱屺瞻、叶浅予、陈大羽、李苦

禅、诸乐三、钱松岩、崔子范。这次,他还与朱屺瞻、陈大羽一同应北京画院邀请,三人合作了大幅花鸟画,并为北京画院收藏。

进入20世纪80年代,汤文选再次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宋、元、明、清及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演变史,研读了大量西方艺术各时期、各画派的画集。针对当时国内各种美术思潮的争论,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河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几次讲学中提到:“轻视传统的人根本不懂得传统,我主张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在艺术上,传统与现代没有一条鸿沟,我希望我的作品,既有深厚的传统,又有现代气息。”他还在多个场合提出:“画画博大为上乘,个性为中乘,物象为下乘”;“要博大精深,返璞归真,天人合一。”

1983年以后,汤文选的艺术创作进入第二个高峰期。他创作了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花鸟画《村头拾趣》、《战正酣》、《晨光》、《秋忙时候》、《晨雀》,参加全国画展后均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还创作了《农家一瞥》、《晒场上》、《频闻户户唤猪声》、《脱兔驰晨光》、《报晓》等。这批作品以朴素的农村生活场景入画,突破了传统花鸟画的表现领域,拓展了花鸟画的艺术境界,具有独创性,同时还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汤文选创作了一批以老虎为题材的水墨画作品。虎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但汤文选却赋予它前所未见的丰富内涵与表现。《三春晖》、《天伦图》中的舐犊情深;《情却有情》、《双雄》中伉俪间的依恋;《无猜》、《四喜图》、《双童虎》中的活泼天真;《他日兴风会有时》、《三日於菟气吞牛》中的哲理意趣;《英雄梦醒》、《盘龙卧虎》中的壮志雄风;《不向中原逐鹿肥》、《消夏图》中的豪迈威重;《群英会》、《风云际会》、《神威天纵》中群虎的宏壮气象等,这些人格化了的精神意气,是汤文选满怀激情的心血创造,也是他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天籁神游。这是他对这种题材的中国画的一种发展与创新。

1996年6月,汤文选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70余幅花鸟画作品受到观众广泛好评,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对画展给予了很高评价。画展后,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多家出版社为汤文选出版了作品集或艺术评论集。

北京展出后,汤文选画展又赴广东、深圳、山东、武汉等地展出,均反响强烈。这大大坚定了汤文选沿着自己的奋斗方向前进的信心。面对各方好评,汤文选写下

孙中山思想的开放个性

● 贺 渊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韩愈这句寓意深刻的话，用在孙中山身上十分贴切。诞生于19世纪，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孙中山，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盘桓于人们的心中，跃然于文人笔下，是因为他的行动与思想仍然影响今天的人们，给我们以启迪。被时人戏称为“孙大炮”的孙中山，却因其思想的超前性而得到了后人的尊敬。

一个了解世界的人

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孙中山的经历十分特别。他从13岁离开中国前往夏威夷，到28岁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接受的完全是西式的教育，当他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时候，供他驱使的大脑，装满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的热情以及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论。虽然，他生活在传统浓厚的华侨之中，并且全在大学期间，有意识地学习了中国的经史，但是，十分有趣的是，他通过英译本和英文的注释读通了《四书》。因此，我们说孙中山是一个由西学而中学的人，是不为过的。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曾因为反清政府，反袁世凯，先后于1895—1911年和1913—1916年两次长期漂流海外，共计达十九年之久，占他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二。期间，他因革命的需要，多次作环球旅行，到过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目力所及，皆为异乡异土，他山之石，自然而然地成为孙中山为祖国独立和富强而战的武器。革命，使孙中山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了《七十抒怀》：

风雨连宵梦迹新，挥毫欣对晓窗晴；
浮名浪得惭知己，系日长绳伴我行。

1997年以后，汤文选开始了新的思索。如何在绘画形式感上突破传统文人画雅淡疏朗、闲情逸致的格局，而赋予中国水墨画以崇高而又宏伟的精神气度。

1998年，年近75岁高龄的汤文选又开始了新的艺术攀登。他开始作六尺、八尺、丈二、丈六等大幅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为黑白二道，笔阵纵横，墨韵淋漓，显示出了强烈的、独树一帜的精神气度和充满浓郁文人画气息的儒雅风范，令观者击节赞叹。2000年5月，这批作品首次在河南省博物院展出，反响强烈。

面对新世纪的中国画坛，汤文选对民族艺术充满

了自豪感，他说：“风格是什么？风格就是个性。每个画家都在刻意追求，希望画出自己的特点来。古代那些非常高明的画家及其精品的境界，都是我们走向完善的一个阶梯。但前人的路并没有到头，还是要继续走下去，还会出现很多高峰。另外，我们中国水墨为尚的写意画，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公平。有人不是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随着国力的加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水墨画，在世界上会有她的地位，我毫不怀疑。我们的这个东西不亚于毕加索、马蒂斯及国外的各种流派，跟他们不是什么高下之分。所以，我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信心。”

（该文系《汤文选谈艺录》一书代前言，本刊编者在文字上稍有删节）（责任编辑 洛松）

书本，是孙中山与外界沟通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孙中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他精通英语，会看日文、法文书籍和报纸。通过书籍，了解当时世界最新的政治哲学思潮走向，掌握新的科学知识。孙对于新知识的渴求，可以从他的追随者黄季陆先生的回忆中得到充分的证明。1923年冬，黄季陆从加拿大回国。行前，有朋友从美国寄来了两本最新出版的书，其中的一本是罗吉尔和麦克本合著的《近代政治问题》。黄季陆在船上将两本书通读了一遍。到广州后，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问他：“你刚从国外回来，最近外国有没有新书出版？”黄一听正中下怀，连忙将两本书介绍了一番。孙中山坐在沙发上，专注地听着。等黄讲完后，孙中山从旁边书柜中取出一本书，微笑着问：“你所说的《近代政治问题》一书，是不是这一本？”黄一看，正是，再翻开一看，书上有好多横杠和批注，可见孙中山已经十分用心地看过了。这时，黄有些心虚，怕自己说得不准确。孙中山对他说：“读书要多读新出版的名著，这样才能渊博，才能吸收新知。阅读专著也很重要，这样学问才有系统。你现在已经在做事了，更要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作一个落伍者。”可见，孙中山读书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是为了与时俱进，把握时代，为我所用。

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塑造了孙中山开放的个性，在思想上消除了彼疆我界，获得了广阔的空间。

借世界潮流以观中国

孙中山认为，欧美社会发展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相递进的发展过程。罗马灭亡后，民族主义大兴，欧洲各国宣布独立。可是，独立后的各国，执行的是专制统治，这种统治让一般百姓不堪其苦，于是民权主义起，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



孙中山先生

倒而宪政立。随后，到20世纪，物质经济的发展，百年锐于千载，可是人民仍然生活艰苦，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成为主流，劳资冲突，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斗争不安，民生主义跃然而起。

中国的问题，也不脱此三者。孙中山指出外来的侵略造成的民族问题和专制之下的民权问题，当然是亟待解决的。同时，我们应该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弯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预防分配不均和阶级的对立。他提出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此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孙中山虽然致力于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但他关注的却是人类普遍的发展轨迹，并以此来勾画自己的发展模式。他的三民主义，最初更多的是他总结西方经验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矛盾的提炼。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在一开始颇为时人所不解。

孙中山以为参照外国的经验，不仅仅是少走弯路的问题，而且，体现了人类进化的新的准则——人力的进化。他指出人类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

一进化的过程是类似于自然的演变,是人们在未知情况下的自然走向,并无前车可鉴,或是人们在尚不了解规律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而人力的进化却不同,他是在已知的情况下的再选择,是借用前人经验情况下的选择。就好比修路开车,人们只会用近来改良过的最便利的开路方式和最好的车,而不会沿着过去的老路从头走一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孙中山坚信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走一条捷径,后来居上,并令欧美“瞠乎其右”;我们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走向集体主义。他夸耀道:当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落后的中国,一举而成为他们的样板。

由此可见,孙中山学习西方的目的,在于少走弯路,后来居上。

“择别取舍 惟所最宜”

抱着人力进化的信心,孙中山以“择别取舍,惟所最宜”的态度,环视天下,将许多思想熔于三民主义之一炉,用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孙中山对美国人亨利乔治的思想最为青睐。亨利曾经是一个工人,他的境遇,使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社会发展了,物质丰富了,很多人反而更穷了?财富是怎样流入少数人的口袋里的呢?日思夜想,他终于豁然开朗,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以为土地占有者,吸吮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财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用地需要的扩大,地价不断上涨,土地不具备再生的能力,有地者因此截住了社会发展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土地属于全体人类,就像水、空气一样。因此,他提出了征收单一土地税的单税论,使得土地的利益得到共享。孙中山将亨利乔治的思想全盘接受,冠以“平均地权”之称谓,作为“民生主义”的最重要内容。

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同样在思索穷人的面包问题,他的角度与亨利不同。他不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互助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物质进化的惟一方式,自然界的种种迹象表明,善于互助的种群易于生存。同样,人类通过互助和科学的方法,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面包。孙中山在克鲁泡特金与达尔文的学说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思想。他和其他仁人志士一样,以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警示国人:只有自强,才能自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反对外来侵略与民族自强是互为表里的,而从他的内心深处,更多的是将民族自强作为反帝反侵略的前提。但是,他认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是一种野蛮的进化,他们将弱肉强食视为天经地义,是要不得的。人类需要文明与道德的进化,也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在国际关系上,采取“王道”而非“霸道”主义。实际上,他对于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是对于现实状况的承认。因为,现实的国际环境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克鲁泡特金的主义,则是他的愿望,他希望人类应该拥有这样的共存准则。在晚年,他对于苏俄提出的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十分倾心,要求建立扶弱济贫的国际关系。就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中得以并存。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中比较复杂的内容。1916年,他提出了直接民权。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其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中国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将法律制定的权利、法律复决的权利、官吏的选举权和罢免权都交给人民直接行使,以实现真正的民权。县以上,则行代表制,由各县选代表到省,各省选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孙中山勾画了一个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的政体。

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危机暴露了政体的腐败,人们开始对政治制度进行再思考,于是有了各地的进步运动。人们认为

旧的制度已经过时，要求直接选举联邦议员，人民能够直接参政议政。1913年美国修改了宪法，补充了直接选举的内容。在一些州里，陆续实行了人民创制法律和复决法律的权利。本来就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不满意的孙中山，对美国的进步运动颇为认同，并按照他“取法乎上”的一贯作风，要在中国实施最先进的政治体制。

林林总总，无不说明，孙中山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他的思想有着无比丰厚的土壤。

开放主义思想

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合资”、“利用外资”、“承包”以及“开放”之类名词是熟悉的。然而，这些字眼出自孙中山之口，能够跨过近一百年的时间距离，而与我们如此贴近，不能不令人瞠目而又佩服。

1911年10月中旬，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孙中山就在欧洲宣布：“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壑，吾等当首先利用。”首次表述了他的开放主义思想。当然，他这时提出开放，是为了得到各国对于新生的共和国的支持。但是，他以为开放的前提是要以中国利益为本位，以海关税则的自行管理为条件，注意到了民族利益的维护。

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全国各地演说，要在10年内集资60万万元，建成铁路20万里。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一笔巨款从何而来？孙中山以为，可以向外借款。可是一提借债，当时的人自然而然就想到清政府向外借债，总是以出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孙中山的这一想法，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对此，孙中山十分焦虑。他说：现在，我们只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例如军器一门，我们从前所用是弓箭刀枪，试问现在战争，能不能用？……我们既采用西法，即不能

不借用外国人才。倘不借用他国人才，我们中国就要先派十万留学生，至少也要学十年才能回国，办理建设种种事业。试问此十万留学生经费，现在能筹不能筹？试问此建设事业等到十年后再办，能等不能等？款既筹不出，又时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所谓的开放主义，就是借用外国的资金，借用外国的人才，借用外国的生产技术。

孙中山以为，只要操作得好，对外开放不会损害本国的主权。反而会有利于本国的强大。他以美国为例，美国修建铁路，动用了不少的外债，可是，他们并没有面临丧权辱国的危险。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借款都会以主权为代价的。孙中山总结性地说：“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可言。”

何为操作得好？孙中山指出：一方面，中国与外交往，做到平等互利，条件是关税自主，以便于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取消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要完全服从于中国的法律。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民间的行为方式来借款。同时，款项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消费。这样，归还不成问题，使借款起到积极的作用。孙中山以兴建铁路为例，提出了三种办法：一是借资兴办；二是华洋合股，在股份中中国应该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三是批给外国人承包，定以限期，期满后无价收回。他特别指出第三种方法最为有利。比如铁路，我们的铁路包给外国人，让他们修筑，给他们四十年的使用权作为代价，所有权在我们手里，到四十年后，我们就可以无偿地收回。不花一分钱，可得铁路若干，极大地使用了外资和外国的人才。同时，我们的主权也未受到一点损害，何乐而不为呢？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并不是无源之水，他的论断也不是情急之下的信口开河，这是与孙中山了解世界分不开的。毕竟，西方是先进的国家，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只有了解西方国家的人，才有可能从中借鉴，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或者全盘照抄。（责任编辑 程 度）

清代皇权与官吏侵贪

● 卢 经

中国封建专制君主政体延续二千多年,其历史源远流长,其势力和影响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朝吸取了历朝兴衰成败的教训,强化了这种政体,在18世纪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帝制。这种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皇权的形成和高度发展,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官僚制度则十分完备,这种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具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官吏侵贪是其缺陷之一。官吏侵贪的实质是官僚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乾隆中叶,吏治迅速腐败,官吏侵贪肆无忌惮,成为清王朝逐渐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在立法上都对惩治官吏侵贪给以高度的重视,清代也不例外。尽管惩治和防范官吏侵贪的条文非常完备,但它和其它法律条文一样,往往是一种装饰和掩饰,其法律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极为常见,基本上没有什么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思想来维持统治。清代从君到臣的各级官吏,“无论是达则兼善天下地把持朝政,还是穷则独善其身地武断乡曲”,始终把政治作为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贪赃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便利途径。正如康熙帝所言“清官不是一文不取”,所以在这种体制之下,绝对的清官是没有的。

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之下,官僚政治与官吏侵贪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尽管世代代善良的百姓都将严惩贪官污吏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皇帝身上,希望有“青天大老爷”给他们做主,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决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吏侵贪,这是由专制体制本身和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一

清代统治者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都以民本主义作为封建社会反对官吏侵贪的思想武器,而在实践中,皇帝对臣下的要求是“忠实”而不是“清廉”,惩贪虽然是封建法制的重要内容,但它往往是皇权政治控制官吏的工具。

在一个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制来进行统治的社

会中,庞大的官僚队伍是维持专制制度的基本力量,“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皇帝必须依靠这个集团中的每个成员按谕行事,贯彻他的意志。官吏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物质享受和特权,这种享受和特权必须限制在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当官吏的侵贪行为使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受到直接影响,致使“公事废弛”,甚至威胁皇权的根本利益时,皇帝才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和防范。而这种限制和防范效能的发挥,均以当时的政治需要和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清朝监察制度集历代监察制度之大成,监察官拥有广泛的监察权,和其它行政制度一样,深受皇权制约。当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皇帝重视法制时,御史一般能行使其职权;否则,御史的权力就会被削弱或者成为君主滥用权力的工具。各道的监察御史,在进行监察弹劾时,常常受上司的牵制,不能不有所顾忌,敢言之士多不腾达。御史所拥有的广泛监督权,并不是用以纠劾官吏,而是监察他们是否忠于皇帝,是否发挥了封建国家机关专政的职能,这是清代监察制度的实质。

清朝对文武百官所实施的考核制度京察大计军政之法,其目的是“崇奖廉善,摈斥贪贱”,但实施的实际状况却是“援例自陈,文具相沿,无裨实政”,成了各官“博朝廷表里羊酒之赐”。这种考察或者说建立在自上而下的监督,助长了官员贿买请托,徇情枉法的恶习,难收“激浊扬清”的实效。

在专制皇权体制下,各级权力机构的监督制约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官员除侵蚀国库钱粮外,还私自加派,收取各自繁多的陋规,即衙门中历来相沿的不良成例。(陋规中以耗羨最重)它使吏治败坏,藩库亏空,国家财政紧张,人民的不满情绪加剧。为杜绝亏空,增加财政收入,康熙末年提出“耗羨归公”的动议,雍正年间在实施耗羨归公的前提下,为解决官员俸薄和办公经费不足的问题,推广并实施养廉银制度,乾隆时期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养廉银的范围,调整了银额,总督至知县银额每年 20000 两至 400 两不等。养廉银

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从一定意义上说约束了官吏的侵贪行为。

尽管养廉银定得很优厚,但比起过去收受相当于养廉银几十倍的陋规来说还是要少得多。习惯于收受陋规的各级官吏,对耗羨归公和定给养廉以后所受的限制难以忍受,仍然私下暗行加耗私收,并私收其它各种繁多的陋规如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指收受陋规而言。有清一代陋规屡禁不止,有时甚至取得了受朝廷默许的半合法地位,渗透到官员、衙署的政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之中。乾隆中叶陋规泛滥,“科敛竟溢于陋规之外”。

乾隆时期所实施的纸政,则构成了来自上边的侵贪压力。诸如官员或因失察、徇庇之过,他们的养廉即被罚停支;或因官员本无应得之咎,而因工程款项物料工价上涨,原估拨款不敷支出,或因军费开支不能报销的无着款项,从督抚以下各官均要摊扣养廉弥补;或因皇帝、皇太后万寿、出巡、海塘、河工等项经费,均要通省各官,首先是督抚大吏捐廉办理;特别是乾隆中叶形成的罚缴“议罪银”的方式,更让督抚一级的官员不堪重负,他们在政务活动中因犯渎职、失察、违例、徇庇、过误等过失,为避免被革职问罪,均遵旨请自认罚缴“议罪银”以抵赔过失,其数额少则几千两,多则几十万两;还有臣工进贡在乾隆时期日趋制度化、系统化,进贡固定成了督抚一级官员的政治义务,除去常例贡、土贡外还有许多非例之贡,一次贡献物品少则一项,多则上百项,这些贡品的置办均要官员自筹银两备办,有时一件贡品就需要几千两银子。罚扣养廉、捐廉办理公项、罚缴“议罪银”、赔补官项、臣工贡献使各级官吏特别是督抚一级的官员养廉名存实亡,经济上不堪重负,他们大多以此为借口,勒索下属,借此大肆侵贪。

再有,由于乾隆朝中期以后物价持续上涨,本已不敷用度之资的养廉银随物价的上升而日渐贬值。经济的繁荣,社会风气的日趋奢靡,人性的弱点受其诱惑无法克制,在官僚政体的特殊的社会环境驱使之下,“(官吏)非本性之贪,国家之迫使之,不得不贪也……朝

廷果不知耶，抑知而故纵邪？”无论皇帝采取多么严厉的办法打击和惩处，即使“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而社会效果则只能是“诛殛愈众贪风愈甚”。

二

封建皇权专制的官僚制度以君权为核心，存在着政治上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既表现为君臣之间不可逾越的主奴差别，也表现为上司属员之间的严格的政治隶属。属员的政治生命权柄往往操纵于上司手中，保举题缺、奖惩黜陟、升转迁徙均须由上司提议或决定。下属对于上司只有竭力奉迎之能事。“在这种情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是对国王负责”，“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地图其私利了”。

这种上下级政治从属的关系，造成政风颓废，官吏之间争夺利禄，贪赃鬻法，置人民生死疾苦于不顾，借助各种非正常手段，联络关系，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旦事情败露或遭到查处，他们之间因利害关系所至，则相互包庇，官官相护，形成牢不可破的势力与皇权周旋对抗。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发生的折监冒赈案，全案通省从总督、藩司到知县一百多人参与，侵贪达七年之久，“竟无一人言及”，使皇帝“实为寒心”。官僚政体之下，权钱交易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政治上的权力关系与物质利益紧密结合，使政治领域内的利益分配日趋复杂化，贿赂逐渐成为以物质利益方式调节传统政治的手段，使封建国家的行政、司法监督等成为一纸空文。

三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构建于宗法制度和血缘心理的亲族型文化，这种亲族型的文化以孝悌为中心，是皇权统治的基础。在实

际的政治活动中，尽管官僚政治原则要求其成员克己奉公，严格按照法定原则办理，充分履行权力赋予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传统的亲族情感往往越过伦理范围，成为政治行为的实际支配。

官是特权和财富的象征，在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上，做官可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是敬孝的极至。但要获得官位，无论从正常途径或非正常途径，都必须得到亲友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资助。作为回报，做了官的人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满足自己物质欲望的同时，还要满足和照顾亲情关系范围之内成员的各种利益和愿望，以此来维护和提高血缘家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为自己防备身后之事。

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亲族情感结合，从而使营私舞弊得到了庇护并开拓了途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亲族情感驱使官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欲望，置君臣之义于不顾。清代虽然规定了严格的回避制度来抑制亲族对官僚政治的侵蚀与影响，但其主要作用只是以此来限制官吏结党威胁皇权，并不是整肃吏治的根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它也只能从地区上限制亲情的影响，而对其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世交、同寅、门生、故吏等等）就失去了约束力。况“人臣苟不能秉公执法，虽在数千里之外，庸必无姻亲故旧邪？”

所以，专制皇权及皇权政治体制所具有的致命缺陷，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构成了官吏侵贪的根源，注定了皇权与官吏侵贪的本质。在这种政体之下，官吏的侵贪决非严刑酷法所能限止，也非英明皇帝的说教所能感化，它只能短暂地使他们收敛，而不能彻底地根除这个毒瘤。

（责任编辑 吴 思）



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石室一隅 老人見其畫
主其藝大心大矣 幸定必為其作詩 謹題



▲ 藝芝嵐 作



◀ 刘建华 作

▼ 张朝翔 作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孙中山思想的开放个性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十年功夫非寻常

《炎黄春秋》的春秋

清代皇权与官吏侵贪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ISSN 1003-1170



07>

9 771003 117002